

貌合神離之兩岸關係： 戰爭前夕福建與臺灣的經建與農業調查之交流 (1934-1937) *

林文凱**

摘 要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與福建關係的研究，過去研究主要集中在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推展與臺灣籍民的活動等研究議題，並獲致豐碩成果，本文則擬探究學界較少關注的 1934-1937 年間兩岸經濟建設與農業調查活動的「學知交流」。本文發現陳儀 1934 年初就任福建省主席後，福建與臺灣之間官方互動日益頻繁，雙方推動了一系列的經濟建設與農業調查活動之交流，包括三次福建官方大規模的臺灣經建與農業考察活動，還有臺灣總督府農政與水利專家到福建各地的經建視察與農業技術指導活動。本文將指出這一系列交流活動，與福建官方的經建學臺灣政策以及臺灣總督府的南進政策之間的複雜關聯，分析這一合作交流背後臺灣總督府與福建省政府的不同意圖，並討論過去學界所忽略的，這一交流對於 1934 年以來福建省政，尤其農政近代化建設的意義。

關鍵詞：經建學臺灣、農業調查、學知交流、南進政策、福建省近代化

* 本文係筆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臺灣與福建關係：日治時期臺灣與福建之間經濟與農業調查學知的交流（1895-1937）」（MOST 106-2410-H-001-079）成果之一。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 2017 年 11 月 28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週二演講活動」，非常感謝與談人林滿紅教授與臺史所研究同仁許雪姬教授與鍾淑敏教授等所提示的寶貴意見。本刊三位匿名審稿人也提供深入的修改意見，謹此致謝。但文責仍應由筆者自負。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8 年 11 月 6 日；通過刊登：2019 年 3 月 12 日。

- 一、前言
- 二、1937年中日戰爭前的中／日與福建／臺灣間關係之演變
- 三、1934-1937年間福建官方的臺灣考察活動
- 四、1935-1937年間臺灣官方的福建考察活動
- 五、戰前臺灣、福建交互考察活動對於福建省政的影響例證
- 六、結論

一、前言

日治時期臺灣與福建的互動關係，廣為日本與兩岸學界的歷史研究所關注。學者們注意到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桂太郎、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等臺灣殖民官員，曾經陸續推動帶有武力佔領意圖的南進福建計畫。先是 1898 年，趁著西方各國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之際，強迫清帝國接受福建屬於日本勢力範圍的「福建省不割讓」要求；其後又在 1900 年八國聯軍入華期間，暗派日本僧侶縱火燒毀日本在廈門的東本願寺布教所，然後以保民為由派遣海軍艦艇佔領廈門，但因日本元老反對、且遭英美德等列強的嚴重抗議而退兵，計畫未能得逞。¹

其後，日本帝國與臺灣總督府放棄武力南進，但仍持續推動非武力的南進政策，臺灣總督府、福州與廈門領事館以及相關的民間機構，不斷生產各種福建地區的調查資料，並據以制定和推動各種南進政策，藉機擴大日本帝國在福建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勢力。有關這段時期的南進政策問題，日本與兩岸學界如中村孝志、梁華璜、近藤正己、陳小沖與鍾淑敏等前輩學者，已經利用大量相關史料，針對日本帝國與臺灣總督府的南進政策演變，特別是在福建的教育、新聞與

¹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福建政策〉，收於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閩關係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頁 37-62；梁華璜，〈日本帝國主義與廈門事件〉，收於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閩關係史〉，頁 63-100。

醫療等對岸經營事業，以及臺灣籍民的問題，作出豐富的研究成果。²

另一方面，許多學者也注意到 1910 年代以來，福建官方與民間開始關注臺灣在日本統治下的經濟建設、農政與教育等的發展，因此陸續有官方派遣考察團或者民間知識分子自行前來臺灣進行經建、農政與教育調查，希望借鑑臺灣經驗來推動福建省政的近代化。這些調查活動留下了大量的調查資料，兩岸學者如汪毅夫、褚靜濤、鄭梓、潘健、林星等人利用這些資料作了不少的研究。有關這些臺灣調查活動的分析，可以粗分成兩類，一類是分析 1910-1933 年間福建官民的臺灣考察活動，另一類則是關注分析 1934-1937 年間陳儀主持閩政期間，三次大規模臺灣考察團活動。³

²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後藤乾一，〈台湾と南洋：「南進」問題との関連で〉，收於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2：帝国統治の構造》（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 147-175；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灣關係史》；梁華璜，《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梁華璜，〈第二輯：對岸政策〉，梁華璜，《梁華璜教授臺灣史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頁 145-242；近藤正己，〈第二章：台湾總督府の「南進」〉，收於近藤正己，《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頁 61-139；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鍾淑敏，〈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收於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北：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399-451；鍾淑敏，〈拡散する帝国ネットワーク：廈門における台湾籍民の活動〉，收於石田憲編，《膨張する帝国 拡散する帝国：第二次大戦に向かう日英と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頁 121-161。另外，經濟史學者林滿紅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貿史的研究，雖不直接論及日本帝國的南進政策，但對臺灣與福建經貿關係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其率先指出臺灣資本利用與配合日本南進政策，而在兩岸經貿關係有了發展的空間，並提出臺灣技術回流大陸的現象，很值得參照。參見林滿紅，〈臺灣資本與兩岸經貿關係（1895-1945）：臺商拓展外貿經驗之一重要篇章〉，收於宋光宇編，《臺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67-139。

³ 以 1911-1933 年間的臺灣調查活動為主題的分析，有汪毅夫，〈臺灣遊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臺灣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收於汪毅夫，《閩臺歷史社會與民俗文化》（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頁 10-20；賴恆毅，〈臺灣的行旅經驗及其文化意涵：以「臺灣勸業共進會」相關記錄為例〉，《實踐博雅學報》（臺北）14（2010 年 7 月），頁 89-113；褚靜濤，〈第二章：大陸與臺灣的民間交往〉，收於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101-160。以上研究的問題與侷限性，參見筆者另文的評述與分析：林文凱，〈日本治臺經驗取鑑：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01（2018 年 9 月），頁 117-155。另以 1934-1937 年間福建官方調查活動為研究主題的，如褚靜濤，〈第三章：陳儀與福建省政〉，收於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頁 161-217；鄭梓，〈1930 年代福建如何「經建學臺灣」？：以日治時期兩份「臺灣考察報告」為核心的初探〉，收於賴澤涵、朱德蘭主編，《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頁 143-167；潘健，〈1930 年代福建「經建學臺灣」的三次考察〉，《閩臺文化交流》（漳州）2010:3，頁 36-42；嚴如平、賀淵，〈陳儀全傳：蔣介石重臣陳儀的傳奇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 79-204；林星，〈博覽會視角下的近代閩臺交流〉，

本文注意到多數有關臺灣與福建互動關係的研究，通常都是個別利用臺灣總督府的南進調查資料或者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資料，分從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或是福建的臺灣經建考察活動的單一視角來進行研究，而很少同時關注臺灣與福建兩方面的政策目標，以及兩種調查活動之間的複雜關係。這種單一向與史料運用的討論，在部分研究議題上會造成分析上的盲點。就以本文主要研究的 1934-1937 年間兩岸的經建與農政調查之研究為例，近藤正己、褚靜濤、鄭梓、潘健與林星等學者的研究，雖然得出不少重要的研究發現，但因研究關注點與取徑所限，也留下一些進一步分析的空間。

首先，如日本學者近藤正己主要關切與批判戰前日本帝國與臺灣總督府如何以臺灣為基地推動南進政策，藉以擴大日本帝國在福建等華南地區的政經與文化勢力。其研究主要利用日文的南進政策史料，詳細描繪了 1910 到 1930 年代期間總督府配合福州與廈門領事館，在福建地區所推動的一系列南進政策，並討論了大正南進期到昭和南進期相關政策的變化。與本文討論直接相關的是，近藤指出隨著九一八事變後日中關係的演變，1933 年開始總督府南進政策針對福建地區的種種作為，主要包括 1934 年 7 月總督府與華南各日本領事的「對岸領事商討會」、1934 年陳儀主政以來總督府推動展開各項與福建省政府的經建農政調查與參訪交流、1935 年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設立等南進產業政策。⁴

近藤正己清楚地描繪了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外務省、海軍軍部、臺灣軍還有總督府各機構對於福建地區各種層面的南進政策的協調與作為，這些政策分析對於我們了解 1934-1937 年間戰前期臺灣福建互動關係，相當重要。不過因關注議題所限，他並未討論福建省政府為何如此積極地回應總督府帶有明顯侵略意圖的南進政策，既未觀照這段時期兩岸積極交流背後其實「貌合神離」、各有所圖的複雜關係，更未曾分析戰爭前夕這些福建與臺灣經建與農政交流的長期歷史意義（參見其後說明）。⁵

《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州）2011:2，頁 11-16；林星，〈日據時期閩臺農業交流的概況及特點〉，《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福州）2012:4，頁 103-109。〔按：中國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以下同〕。

⁴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頁 61-139。

⁵ 近藤正己僅提到陳儀 1935 年 10 月間來臺進行博覽會參訪時，曾公開發言指出對於福建與臺灣密切經建交流的積極期待，提到：「這些發言雖可能為客套話，但其中提到希望利用臺灣方面投資推動福

與此相對，大陸學者褚靜濤的研究，詳細討論了日治時期尤其 1910 到 1930 年代期間大陸，尤其福建地區與臺灣的民間與官方交流。以本文主要關切的 1930 年代福建臺灣交流來說，褚靜濤詳細描繪了陳儀在其主政期間（1934-1941）如何透過經建學臺灣的政策作為，推動了福建省政的初步近代化，他對這個時期短暫但頻繁交流意義的關注評價，與其他兩岸學者的忽略或否定評價不同。⁶ 褚靜濤指出：「陳儀認為，福建要想走上新生之路，必須洗心革面，借鑑臺灣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模式，即在政治制度上實行一元化領導，建立現代省政制度，加強省政府的權力，特別是省主席的權威；推行統制計畫，以政府權力來興辦實業，建立公營企業，限制私人資本的成長；加強調查研究，制訂計畫，強調數字管理，注重設計、執行、考核；發展農業，推行品種改良，組建合作農場」。⁷

褚靜濤的研究，對重新評估這段歷史交流的意義，提供一個適當的出發點。不過，因研究關注點不同的緣故，其分析基本忽略了這些兩岸交流活動，並不純粹是福建單方面主動的產物，其背後其實有著近藤正己等人所指出的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的引導，他也未關注這段互動交流背後的貌合神離現象；而且他對於陳儀經建學臺灣的相關分析，僅著重其在人事行政、統制經濟、省縣行政體制的改革，對臺灣經驗主要在福建農政改革等方面的應用之討論相當不足，尤其他還忽略了同時期臺灣農政官員專家的福建視察等活動，對於當時正積極展開的農政與水利改革等事業之具體影響。

另一方面，兩岸學者鄭梓、潘健等人也對 1930 年代中期福建經建學臺灣問題作了專門的探討，例如嚴如平與賀淵兩人在陳儀傳記研究中論及這三次臺灣參訪團，並對其歷史意義進行分析。有意思的是，針對這些考察活動的歷史意義，鄭梓因為不熟悉福建省政的演變，在其結論中主張 1930 年代中期日本帝國大舉侵華的狀況下，尤其華南福建地區在日本南進政策衝擊下，福建沿海充斥大量日

建經濟發展可能為真的」。參見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頁 93。

⁶ 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頁 161-217。另參見褚靜濤，〈陳儀與福建的現代化〉，《閩臺文化交流》2007:1，頁 56-63。對於陳儀經建學臺灣政策效用的否定評價，如黃新憲主張：「兩次考察，在事實上鮮有成果，病在無整個考察計畫，到臺後，受日人招待，只能走馬看花式之流覽風光，記載若干呆板資料（如數位、條文等），對於日人開發臺灣之整個策略、體系和方法與技術之運用，無從探究，在本省建設事業上自難發生作用。」參見黃新憲，《閩臺教育的交融與發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 150-151。

⁷ 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頁 176。

本政客、軍人、特務乃至浪人，「主閩當局臨此立即的危局，已然求生不暇、窮於應付，豈有餘暇再行推動各項大規模的所謂『經濟建設年』、借鏡『臺灣考察經驗』、抑或『經建學臺灣』云云」，認為陳儀大力推動的「臺灣考察」僅是一場「未完成的經建革新大夢」。⁸

不過，潘健與嚴如平等大陸學者的評價，則與前述褚靜濤的觀點類似，主張這三次考察活動儘管有些侷限性，但的確對於福建省政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借鑑作用。⁹ 另一方面，嚴如平與賀淵的研究，則指出陳儀之所以回應臺灣總督府的考察邀請，除了經建學臺灣的考量外，還有想要探明日本對福建南進陰謀的外交目的，這是重要的提示。¹⁰ 本文基本同意潘健等人有關臺灣考察活動對於福建省政具體影響的分析，不過因關切點的侷限，他們的研究與褚靜濤的研究一樣，忽略了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一方的脈絡，對於同時期臺灣官員專家的福建參訪活動有所忽略，同時有關臺灣經驗對福建農政建設影響的討論也有很多待補充的餘地。

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學者林星的閩臺交流研究，其研究對於日治時期福建臺灣的農業交流還有各種官方考察活動，作出了比較詳盡的討論，尤其也提到了多數學者所忽略的臺灣農政官員專家之福建考察活動。不過，其分析一樣忽略了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在這些交流活動中的複雜影響，誤以為臺灣官方在政策上一貫阻撓閩臺之間的各種交流，從而把這些頻繁的閩臺交流主要詮釋成閩臺人民在總督府重重阻撓下，基於歷史文化、語言傳統與民族認同下的主動作為。¹¹ 筆者同意閩臺之間的交流，有部分是兩岸人民歷史認同意識下的主動體現，但更應注意的是 1930 年代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對於這些交流的引導作用。

最後應該注意的是，晚近國際學界有關日本帝國史研究的典範從主要關注政治、經濟制度面的殖民地壓制與剝削的帝國主義論分析，以及關注殖民地人民政

⁸ 鄭梓，〈1930 年代福建如何「經建學臺灣」？：以日治時期兩份「臺灣考察報告」為核心的初探〉，頁 165。

⁹ 潘健，〈1930 年代福建「經建學臺灣」的三次考察〉，頁 38-41；嚴如平、賀淵，〈陳儀全傳：蔣介石重臣陳儀的傳奇人生〉，頁 79-204。

¹⁰ 相對於褚靜濤、潘健等人的研究，嚴如平、賀淵兩人的分析，稍有提到這些考察活動與日本帝國南進政策的關聯，但對於南進政策的內涵，以及在這些考察活動中兩岸官方的各有所圖，並未有充分的分析。參見嚴如平、賀淵，〈陳儀全傳：蔣介石重臣陳儀的傳奇人生〉，頁 104、107-108。

¹¹ 林星，〈博覽會視角下的近代閩臺交流〉，頁 11-16；林星，〈日據時期閩臺農業交流的概況及特點〉，頁 103-109。

經與文化抵抗的民族主義分析，轉向關注在日本帝國擴張、殖民地支配與民族抵抗等政經與文化活動中，各種學術知識（「學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些有關東亞學知的日本帝國文化史分析，不僅關切殖民政策學、法律學、經濟學、農學、社會調查、統計學……等各種近代學術知識，在日本明治維新、帝國擴張與殖民地統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關切其所涉及的東亞學知交流問題。¹² 本文擬運用晚近日本帝國史研究的學知交流概念，分析戰前兩岸之間這些帶有各自明確政治與經濟政策目標的經建與農政調查活動中的學知交流現象。

本文以下將參照南進政策與福建省政近代化的歷史脈絡以及學知交流的概念，分成三個部分詳細討論 1934-1937 年間的兩岸經建與農政調查活動，首先，本文將先交代 1930 年代中日戰爭爆發前夕中日關係的演變，以及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與福建省政演變的具體變化，藉以提供這些調查活動交流之所以發生的具體歷史脈絡。其次，筆者將說明福建官方三次大規模臺灣參訪活動的內容，並且討論這些參訪內容對於福建省政的具體影響，以及參訪活動中福建與臺灣兩方面各自的不同考量。其三，筆者將具體交代同一時期，臺灣總督府應福建官方的要求，幾次派遣臺灣農政官員專家前往福建視察的經過，分析這些交流背後臺灣總督府與福建省政府之間的貌合神離心態，並討論過去學界所忽略的，這一交流對於 1934 年以來福建省政，尤其農政近代化建設的意義。

二、1937 年中日戰爭前的 中／日與福建／臺灣間關係之演變

欲適當定位並詮釋 1934-1937 年間，福建省政當局與臺灣總督府間的經建與農業調查活動，除須要了解晚清以來中日關係的演變外，也須了解臺灣總督府長期來南進考量下的福建經營對策，以及福建省政的長期演變與其對臺政策的變化。

¹² 有關學知交流在東亞近代史與日本帝國史研究的新開展，參見岩波書店 2006 年出版的岩波講座叢書《「帝国」日本の学知》（共八卷），與本文特別相關的社會調查與農學活動的學知交流問題，參見該叢書中末廣昭編，《「帝国」日本の学知（第 6 卷）：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6）；田中耕司編，《「帝国」日本の学知（第 7 卷）：実学としての科学技術》（東京：岩波書店，2006）。

尤其須關照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的轉變，以及福建官方對日與對臺政策的幾次變化。

首先，晚清以來中日關係的變化，包括其對日本近代化學知的學習態度，可以說隨著日本對華侵略活動而不斷變化。1895 年甲午戰爭與 1904 年日俄戰爭以來，晚清朝廷與民間人士清楚認識到日本模仿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意圖，另一方面也開始積極模仿日本維新經驗推動新政改革，並陸續有大量官方與民間自發的日本留學活動。1911 年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後，經過 1915 年日本對華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與 1919 年的五四運動後，學生與知識分子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高漲，中國人的抗日意識日益普遍與深化。

其後，1920 年代以來一連串涉日事件——1925 年青島、上海等地五卅慘案、1928 年濟南事件與張作霖暗殺事件、1931 年東北九一八事變、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變、1933 年熱河事變、1935 年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等——更加顯示了日本對華侵略意圖，並強化了中國人的反日意識。儘管仍有大量留學生持續學習日本學知希望改革國政，但民間的反日與抗日情緒日益高漲，並常發動大規模的排斥日貨運動。尤其 1931 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東北後，中國各界尤其學生青年開始發起全面抗日運動，並呼籲要求國民政府進行武裝抗日運動。¹³

但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政權，面臨來自胡漢民、汪精衛等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內派系與桂系等各地將領等對其領導權的挑戰，中央政權並不穩固統一；另一方面，1927 年國共分裂以來，面對中國共產黨勢力擴大對其政權的威脅，蔣介石不得不積極進行肅清內亂的剿共運動。在種種考量下，他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暫時採取對日姑息政策，避免與日本全面的武裝衝突，希望能夠先行剿滅共產勢力後再行抗日；同時積極推動各項軍事與政經的現代化建設，期望厚植國力並作為對日抗戰的備戰準備。與此相對，持續面臨國民黨武裝討伐的共產黨，則持續宣傳抗日統一戰線，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國共合作統一抗日，這些宣傳相當有效，不僅削弱了國民政府剿共政

¹³ 今川瑛一、松尾大，《日貨排斥：アジア民族主義と日本》（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73）；菊池貴晴，《增補中国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對外ボイコット運動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74）。據統計，從 1908 年二辰丸事件起，到 1932 年九一八事變後一年間，中國民眾共實行過 9 次的大規模排斥日貨運動。參見旭（筆名），〈對日經濟絕交的過去〉，《福建民衆》（福州）2：5（1932 年 9 月 30 日），頁 4-6。

策的正當性，也使得國民政府武裝剿共活動無法有效推進。最終 1936 年底，心切抗日救國的東北將領張學良等人發動兵諫，即西安事變，方迫使蔣介石放棄剿共，開始國共合作統一抗日的政策。¹⁴ 而福建官方與民間對於日本帝國的態度，除與前述日本對華侵略進程有關外，也與臺灣總督府對於福建的南進政策有所關聯。本文前言中提到廈門事件後、1900 年以來，臺灣總督府等日本帝國相關機構利用教育、醫療與新聞政策擴大在福建的政經文化勢力，並持續邀約福建官方各機構來臺進行經濟建設與農業調查等交流活動，希望推銷臺灣建設經驗給福建省政府，並擴大日本帝國在福建的經建農政勢力。儘管如此，因為福建持續為地方軍閥控制，省政紊亂，臺灣總督府與福建省政府的交流合作雖有不少，但規模有限；另一方面，福建省政府從臺灣考察所得的施政經驗，雖已對福建省政改革產生影響，但因 1934 年陳儀主政之前，福建省的行政、財政缺乏有效變革，農業學校等機構設置仍相當有限，因此尚缺少行政人力、財政資源以及教育機構，可將考察所得的日本與臺灣學知有效運用在福建省政的近代化改革上。¹⁵

值得注意的是，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政府就積極透過與廣東、福建的地方政權聯繫，希望建立親日地方政權，以便緩和華南各地的反日現象並有助於滿洲問題的解決。兩廣胡漢民等西南反蔣政權與日本外交人士聯繫頻繁，但最終並未接受日方條件，仍堅持抗日，並在 1936 年胡漢民去世與兩廣事變後，重歸中央。而以福建來說，1932 年蔣介石派遣十九路軍至福建控制省政，並賦予其剿滅福建共黨的戡匪任務。但十九路軍不僅在閩西剿共無成效，反在 1933 年 11 月發動反蔣的福建事變，以聯共、抗日與反蔣為名建立中華人民革命政府。在閩變期間，日本政府一方面與李濟琛、陳銘樞等福建首腦秘密會晤，希望以放棄抗日為條件支持其反蔣，但無法達成協議終無結果，日本因此採取不支持、不干預的方針。事實上，當時主持閩政的十九路軍將領們，剛因 1932 年一二八事變在上海駐地英勇抗日，獲得多數國人的稱譽讚揚，因此雖曾與日本外交人員私下晤談，但並不願與日本合作。

日本帝國對福建政策的突破，係在蔣介石鎮壓閩變，並任命留日將領陳儀擔

¹⁴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249-302。

¹⁵ 有關這段時期臺灣與福建關係，參見林文凱，〈日本治臺經驗取鑑：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頁 117-155。

任福建省主席之後。當時日本帝國為了解決滿洲問題，積極推動南進政策，透過華南各領事館與臺灣總督府積極向福建省政府推銷相關的外交與產業合作政策，希望塑造中日親善的氣氛，擴大其在華南的政經文化勢力，同時也希望福建省政府協助壓制抗日與排日氛圍。相對於之前福建官方的積極反日態度，新任省主席陳儀秉承中央政府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不希望福建方面對日態度過於激進而引發與日本進一步的衝突；另一方面，剛主持福建並希望積極推動省政近代化的陳儀，明白日本治臺經驗可作為其改革的借鑑。¹⁶

如下文將詳述的，陳儀因此回應了臺灣總督府方面的南進政策，開始積極應和其邀請，自1934年到1937年7月戰爭爆發前，進行了一系列臺灣經建與農政考察活動，並借鑑這些經驗推動福建省政的近代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也邀請臺灣總督府派遣相關農政專家，前往福建為其推動中的省政建設提供政策與技術上的建議，以及資金的協助。換言之，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與陳儀的經建學臺灣政策，造就了戰前這段期間福建與臺灣間帶有貌合神離性質的密集交流活動。

在進一步詳細討論雙方的相互考察活動之前，筆者想要透過1930年代前期福建的官方與民間刊物資料，來說明福建官方對日本與臺灣總督府態度的明顯轉變，並了解陳儀的相關政策在福建社會內部面臨的批判與質疑壓力。首先，討論1931-1932年間由福建省立民眾教育館編輯發行的《福建民眾》這一刊物。作為福建當局推動社會教育的重要刊物，該刊主要強調民眾識字教育的重要性，宣傳衛生、知識、破除迷信等觀念，並要求民眾學習自立與自治。值得注意的是，該刊從1931年8月24日發行的第1期就刊載了〈對日經濟絕交〉一文，對當年4月到7月間日本帝國在東北發動的萬寶山等侵略事件，表達強烈的不滿。文中強調日本的陸海空武力比中國厲害，主張唯一打倒日本的方式就是對日經濟絕交：

¹⁶ 有關這段時期日本對華南政策的內容與中國各方面的回應，參見臧運祜，〈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華南政策〉，《近代史研究》（北京）2003:3，頁50-79；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291-295。另外，有關這段時期陳儀等福建省政人士秉承蔣中正的命令，參與對日外交宥和的過程，參見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的諸多文件檔案，如〈陳儀電蔣中正日方疑懼我聯美抗日唯今之計只有擇無妨國家大計之事與日方合作以安其心並請予李擇一旅費赴日必能不辱使命〉，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15-202；〈楊永泰電陳儀奉批准前往十月臺灣博覽會另蔣中正已復函辜顯榮郵寄東京而其致李澤一函亦轉陳核閱〉，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48-090；〈陳儀函楊永泰轉蔣中正報告閩省漁業發展近況今年十月臺灣博覽會可否前往請示及是否收到辜顯榮函〉，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46-092。

「日本地小，出產少，人又多，他國內的一切原料，都是來中國買的，並且把所做的貨品再送到中國來賣，換了許多錢回去，因此他國內的人民才能夠生活，假如我們的原料停止了不賣給他，同時也不買他的東西，這樣的經濟絕交，他國內人民生活，自然發生了恐慌，可不打自倒了」。¹⁷

而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這一刊物的反日氛圍更顯濃厚，策劃了非常多期的反日專號，統計起來從第 1 卷第 6 期（1931 年 9 月 28 日）到第 2 卷第 16/17 期（1933 年 1 月 28 日）共 27 期的刊物中，共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文章主題都是公開宣揚抗日意識，並主張透過對日經濟絕交等方式，來應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同時也表達對於中央政府與東北華北將領不願武裝抗日的不滿。更在各期刊物中，宣傳福建省立民眾教育館的抗日展覽與演講會活動以及該館出版的反日抗日書籍，同時各期刊物的書籍介紹欄目中，大量介紹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書籍，且穿插了很多宣揚抗日主張的插圖與標語。

其次，筆者注意到由福建警友編輯部編撰、福建省省會公安局警官養成所警友發行部發行的《福建警友》雜誌。這個警務刊物 1933 年 2 月在福州發行，停刊於 1933 年 7 月，共發行 4 期。該刊明顯屬於十九路軍刊物，由丘兆琛（十九路軍副師長）題寫刊名，主要撰稿人有竹農、陳炳照、陳邦尊、鄭宗楷、盧鏘、華振中、張永柏等人。主要欄目有一月來之警政、抗日和準備、東北義勇軍實況、小言論等。該刊以交流業務、提高員警修養為宗旨，刊載中外警政記述、時事插圖、所務摘要、時事評論及員警業務修養的文章。

這個刊物與前述《福建民眾》一樣公開主張抗日，甚至有文章主張日本是中國不共戴天的敵國，或主張「把日人殺個乾淨，使福州的警察，成為全國的模範，給人家頌揚，給人家稱道」（第 2 期[1933 年 4 月]）。略有不同的是較少提及對日經濟絕交，而是主張警察應該積極接受軍事訓練。另一方面，此刊物贊成剿共，認為如此才能發展農村經濟，但主張抗日與剿共應該雙管齊下，並呼籲全國各界應該儘快取得共識，團結抗日（第 3 期[1933 年 5 月]）。此外，這個刊物各期最後有關福建警政的報導，也不斷提及福州日籍臺人的逞暴、開設賭場或者臺籍浪人管理、日本福建領事館設置警察、日本警察干涉海關檢查等問題，以表達對於日本與臺灣籍民侵犯中國主權與危害福建社會的不滿（第 3 期[1933 年 5 月]、第

¹⁷ 村（筆名），〈對日經濟絕交〉，《福建民眾》1（1931 年 8 月），頁 3-4。

4/5期[1933年6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期刊中有一篇〈抗日和準備〉，提到福州民眾的抗日準備首先就是全面斷絕與日本人的各種聯繫，文中最後並特別提到臺灣籍民的問題：「最後還有一件事值得我們研究的，就是在努力抗日中對於臺灣僑民應取何種的態度，那我敢大膽的說，絕對不能有絲毫仇視排斥之心；因為臺僑也是我們的同胞，他們不幸做了無家可歸的亡國奴，受倭奴的欺侮壓迫，實在非常可憐，我們深感兔死狐悲，萬不可中了日本人的毒計，致使我們固有的同胞，反而互相仇視，自行殘殺，我們對臺籍同胞有知識者，要切實連絡，親切攜手共同反抗倭奴，對其知識稍差，為倭奴所利用者，也要設法勸導，使其覺悟，反抗倭奴，我們更希望臺灣朝鮮都實行革命，以聯合打倒日本，這也是我福建民眾應常去做的一件抗日工作」。¹⁸

接著，筆者注意到1934年初陳儀上臺後，原福建省立民眾教育館發行的《福建民眾》期刊改版，同年8月間重新編輯發行的《福建民眾教育季刊》，已不再出現過去那種激烈的抗日主張，甚至連抗日這種字眼都不再有，這與陳儀政府開始推動與臺灣總督府的合作，並希望克制福建抗日氛圍避免衝突有關。這一刊物仍以民眾社會教育為主調，開始積極配合中央政府宣傳新生活運動，並推動帶有黨化色彩的民眾教育，同時積極宣傳剿共的重要性。應該注意的是，該刊物雖然不提抗日與反日，但其實字裡行間仍然意識到日本的侵略，並要求全民應積極備戰。

正如這個刊物第1期福建民眾教育館館長謝大祉的發刊詞，就提到：「本省僻處海隅，與臺澎一水之隔：內則農村破產，共匪橫行；外則強鄰虎視，浪人充斥。民眾意志之消沉，達於極點，民族意識之薄弱，較之他省則為尤甚。以是，本省民眾教育之需要，亦較他省尤為迫切！」另外該期刊也報導了福建省立民眾教育館所設立的「國防教育陳列室」，並說明了設置動機：「我們認為近幾年來國際軍備增加空氣的緊張，同九一八強占國土事實的告訴，直到未來大戰的爆發，在所難免，所以必要民眾知道戰時自衛的必要，同防空的方法……這是我們消極方面的意義。並要求紀律化、軍事化、使國民有軍事常識，才能摧克強敵，衛鄉守土」。¹⁹

¹⁸ 華強素，〈抗日和準備：華強素先生在警官養成所之講演〉，《福建警友》（福州）3（1933年6月），頁45-50。

¹⁹ 〈三月來本館的各項重要事業 五、設立國防教育陳列室〉，《福建民眾教育季刊》（福州）1:1（1934年8月），頁340。

最後，應注意的是，就在福建省政府與臺灣總督府日益緊密交流之時，福建民間尤其各種青年學生與左派刊物，對於這些交流活動非常不滿，不斷對日本與臺灣籍民在福建勢力的擴張提出警告，並對陳儀政府提出嚴厲的批判。²⁰ 首先如以學生為主體的旅滬福建反日救鄉會發行及編輯的《福建呼聲》，該刊 1936 年 12 月 15 日第 2 期的文章標題如下：〈援綏宣言〉、〈故鄉情報〉、〈向綏遠的戰士致最敬禮〉、〈德義日協定後世界動向〉、〈怒吼罷福建的學生〉、〈泉州通信〉、〈從綏遠的抗戰說到全民族的抗戰〉、〈從七位被補愛國志士說起〉、〈目前福建的危機〉。

以上各篇文章除了〈怒吼罷福建的學生〉、〈目前福建的危機〉、〈故鄉情報〉與〈泉州通信〉外，從標題來看就可判斷，都是直接呼籲積極團結武裝抗日的報導。而在〈怒吼罷福建的學生〉一文，則表達對於日本南進政策與目前福建省政府政策的不滿：

中華民族的危機，已是無可否認的到了最後關頭了，同時，在敵人南進政策下的福建，亦已跟著民族危機而到了空前深刻的時候了，一瞬間，一息間，福建將成為東北第二了。的確，福建已到了「九一八」的前夜了，兩年來「偽自治」的運動，有如雨後春筍地蓬勃著……均無非是欲亡福建的先聲，在不久的以前，廈門海的敵艦會操，要求劃廈門為敵人行政區，設特種商業學校，福州稅務司聘請日人中野，省政府聘日人為顧問，在最近，有要求開闢福州至延平鐵路事，有聘請日人為自來水廠技師事，有崇武、莆田一帶海面不時怪機怪艦出沒事，這些這些，告訴我們福建的命運是怎樣底危險？……福建自人民政府塌臺後，新主席上任以來，他是無恥地極力與敵人送秋波，極力逢迎其主子，極力高壓民眾做救亡運動，極力逮捕及殺害愛國青年（四千人以上），使得一般青年鎮日在血腥的恐怖下敢怒不敢言。²¹

而在〈目前福建的危機〉一文，則主張日本帝國之所以積極侵略福建，是因為福建為中國華南的要衝、有豐富礦產、是日本商品的廣大市場、是中國民族解

²⁰ 有關這些具有福建背景的左派刊物，包括下面將討論的《福建呼聲》等的出版與編者背景，參見鐘健英、吳國安，〈論抗戰時期福州報刊的救亡活動及其歷史意義〉，《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1989：3，頁 58-67。

²¹ 〈怒吼罷福建的學生〉，《福建呼聲》（上海）2（1936 年 12 月），頁 5-7。

放的一支有力支流，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必須積極奪取福建。另外也提到了日本帝國對於福建的奪取表現包括：一、福建銀行錢莊企業倒閉，日本銀行集團取代；二、失業人口空前增加，農村經濟破產；三、賭局、煙局、淫窟、舞場、咖啡店遍地林立，紅丸鴉片公開販售毒化民眾；四、日本浪人勢力膨脹倒行逆施；五、日本浪人與本省土匪流氓結合，大量設立各種偽組織訴求中日親善，收買愚民擾亂治安並推動偽自治運動；六、日本帝國主義強行收買農村肥沃土地，或強迫種植各種戰爭之原料，又或收購大量礦藏豐富的礦山；七、日本帝國主義配合福建政府強行收買農村土地或者礦山田土，忠實執行中日經濟提攜；八、日本大批軍艦駐守福建海口；九、福建政府已經失去其保障中國人民生命財產。文中最後並提出六大呼籲：驅除日本在福建一切勢力、剷除漢奸、爭取救國運動的自由、全中國人聯合起來共同爭取中華民族自由解放、反對摧殘抗日的內戰、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共同起來爭取自由解放。²²

至於〈故鄉情報〉一文，則都是報導日本勢力在福建擴張的問題：「日人運私抵閩，臺人竟兇毆關員」、「福州奸商運米赴臺，米價因此高漲，民食影響甚鉅」、「當局獻媚日人解散全省緝私隊」、「日本籍民向廈門日領要求武裝自衛」、「日方要求建築福延路，建設廳說是若無其事」、「閩自來水廠聘日本技師（24人）」。
 〈泉州通信〉一文，則是以人事時地物兼具的寫實報導方式，詳細地描繪當時各種日本勢力、臺灣籍民與福建漢奸，在福建各地協助日本帝國經濟擴張與軍事侵略的行徑。²³ 目前現存的1937年第3期（1937年3月15日）、第4/5期（1937年7月1日）的《福建呼聲》，其內容也都是前述以宣揚武裝抗日、日本侵略福建與批判福建省政府對日親善為主題的報導。

除此之外，在中華留日學生會出版的《小譯叢》、文化週報社出版的《文化週報》、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籌備會出版的《學生呼聲》、政論性刊物《群力》等刊物，也都可以看到與《福建呼聲》同樣報導主題的文章。²⁴ 透過這些期刊內容，

²² 〈目前福建的危機〉，《福建呼聲》2（1936年12月），頁11-14。

²³ 〈故鄉情報〉，《福建呼聲》2（1936年12月），頁2-3；〈泉州通信〉，《福建呼聲》2（1936年12月），頁7-8。〔按：該刊該期的發刊日誤載為1931年12月〕。

²⁴ 如異人譯，〈福建民眾之抗日運動（The Voice of China Shanghai）〉，《小譯叢》（上海）1:2（1936年6月），頁91-94；來件，〈人民呼聲：福建軍人反日救國會宣言〉，《文化週報》（西安）1:3（1936年11月23日），頁18；不著撰者，〈福建當局媚日辱國之鐵證：福建省政府訓令保安處公文〉，《學生呼聲》

可以發現全國各界尤其青年學生對於陳儀與臺灣總督府間的交流，就如同對於中央政府的對日綏靖政策一樣，其實有著強烈的質疑與批判。

三、1934-1937 年間福建官方的臺灣考察活動

陳儀主政後的福建官方主要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臺灣考察活動，一是 1934 年 11 月由福建省建設廳長陳體誠領軍的 22 人考察團，實際參訪行程 11 日。²⁵ 二是 1935 年 10 月省主席陳儀自己帶隊共 18 人的經建考察團，前後 8 日。²⁶ 三是 1936 年 12 月廈門市長李時霖帶領的 11 人考察團，前後實際參訪共 11 天。²⁷ 這三次調查中一、三次都有編印出版詳細的考察報告，記載這些考察活動的動機、內容與主要心得，可據以細論本文特別關切的臺灣經濟建設與農業學知的考察內容。除此之外，這段時間因為總督府的積極招攬，以及福建官方的鼓勵，也有其他不少大小規模的福建官方與民間的臺灣調查與參訪活動。²⁸

(上海) 1:2 (1936 年 5 月 16 日)，頁 27；朱銜，〈告福建青年〉，《群力》(上海) 1:9 (1936 年 4 月 5 日)，頁 5-6；記者，〈本刊在瀋陽與福建的厄運〉，《群力》2:2 (1936 年 5 月 25 日)，頁 5。

²⁵ 參見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原由福建省建設廳於 1935 年 3 月出版，筆者使用文本係引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全文資料庫」，下載日期：2016 年 4 月 1 日，網址：<http://stfb.ntl.edu.tw/cgi-bin/gs32/gswweb.cgi/ccd=kMtgkS/record?r1=1&h1=4>。

²⁶ 參見使領館消息：駐臺北總領館通訊（第三、四、五號），〈(一) 福建省政府陳主席來臺視察暨本館招待情形、(二) 廈門市長王固磐來臺親察暨本館招待情形、(三) 本館招待來臺參觀博覽會併視察文化產業各團體紀略〉，《外部周刊》(南京) 92 (1935 年 12 月 16 日)，頁 8-10；周明德，〈福建省主席陳儀參觀「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臺灣風物》(臺北) 49:3 (1999 年 9 月)，頁 9-18；〈福建省視察團を迎へて 善隣關係促進の絶好の機會〉，《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0 月 23 日，第 2 版。

²⁷ 參見李時霖總編，《臺灣考察報告》，原由廈門市政府秘書處於 1937 年 6 月出版，為非賣品，重刊後收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臺灣輿地資料專輯(第 8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²⁸ 如 1934 年 4 月間，福建集美高級農業學校農產主任李仙根帶領 13 名該校職員學生到臺灣的參訪活動，參見〈親切な案内説明で 愉快に視察した 福建集美學校の農場主任 李仙根氏朗かに語る〉，《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5 月 11 日，第 3 版。另如 1937 年 2 月底福建省政府委員林知淵與外務科長的臺灣參訪，以及 3 月 18-22 日福建省記者團的臺灣參訪活動。參見〈「支那中で唯一の 親日省にしたい」 福建省政府要人林知淵氏等 盛京丸にて來臺〉，《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3 月 1 日，第 7 版；〈福建記者團の一行 督府及び各所を視察〉，《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3 月 18 日，夕刊第 2 版。又如 1937 年 4 月 19 日到 5 月 2 日間，福建省立長樂農校畜牧教員兼長樂牧場副技師梁達新曾到臺灣視察畜產狀況，並購買了 9 頭種豬歸國。參見〈福建省畜產指導者島内視察〉，《臺灣之畜產》(臺北) 53 (1937 年 5 月)，頁 46。

(一) 1934年11月間建設廳長陳體誠帶領的第一次考察團

本次考察團團員共22人，名單如下：建設廳長陳體誠、公安局長李進德、建設廳技正林紹誠、財政廳科長鄭晉卿、財政廳統計股長夏懋信、省政府諮議周敬瑜、省政府諮議楊著誠、省政府秘書處技術員沙俊、省政府秘書處技術員陳仲克、保安處秘書闕榮興、省政府秘書處科員葉鏡允、教育經費保管會秘書岑如森、教育團公有林場長李先才、省立福州農業職業學校校長林禮銓、省立福州工業職業學校校長陳昭時、省立莆田農業職業學校校長黃天宇、福州英華高中學校校長陳芝美、福建協和大學校助教張天福、福州電氣公司董事兼經理劉愛其、福州電氣公司總工程師鮑國寶、福州電氣公司農村電化部技師陳振鐸、保安處幹部訓練所上校教育長屈端。

考察工作共分四組：農林、工業、民政、經濟四組，每組委員若干人，最後並分由各組委員撰寫考察報告。葉鏡允/考察日記、陳體誠/總論、陳振鐸/米及稻作附甘藷、楊著誠/甘蔗、岑如森/製糖、楊著誠/園藝、張天福/茶業、李先才與林禮銓/林業、劉愛其/水利灌溉、林紹誠/農林機關及農會、沙俊/漁牧、鮑國寶/電氣事業、陳昭時/鐵道、周敬瑜/專賣事業、周敬瑜/土地整理、鄭晉卿與夏懋信/財政、李進德/警政、陳芝美/教育、陳仲克/衛生、李進德/癲瘋病之治療、張光漢/鴉片癮之取締、陳文濤/書後。²⁹

考察團行程主要如下：1934年11月13日從福州出發，有閩報報館社長松永榮送行，搭乘日本輪船盛京丸赴臺，前福州日本領事館武官酒井同船。14日到臺灣基隆港，中國在臺總領事與臺灣總督府等官員迎接，上岸後簡要參觀基隆市役所與臺紳顏國年家園林「陋園」、基隆稅關後，前往臺北，中午到總督官邸宴會，分別由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與福建省建設廳長致歡迎詞。實際在臺灣的參觀行程為14-24日，25日搭乘輪船返回廈門。

該團參訪期間除參加臺灣官方、民間商紳與在臺僑領的飲宴歡迎活動外，共陸續參訪以下機關——14日：基隆稅關、臺北水源地、臺北帝國大學（以下簡稱臺北帝大）、中央研究所農業部；15日：中央研究所林野部、商品陳列館、臺北州立工業學校、博物館、中央研究所士林園藝試驗支所、臺北州農業傳習所；16

²⁹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目次、頁1-6。

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安平製鹽會社、高雄水產物貯藏廠及製冰廠、洋灰（水泥）廠；17日：恆春郡役所、恆春種畜場、鵝鑾鼻燈塔；18日：屏東飛機場、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高雄州農事試驗場、製糖會社；19日：嘉南大圳、嘉義市役所、營林所嘉義出張所製材工場、中央農業試驗所嘉義支場、製糖會社；20日：阿里山；21日：營林所嘉義出張所、阿里山派出所；22日：日月潭、蓄水池、水力發電廠、青果同業組合、香蕉檢查所、農業倉庫、教育博物館；23日：部分參觀桃園角板山製茶工場、番人手工展覽室、番人貿易所，另部分人參觀臺北市南區警察署新起町警察官吏派出所、臺北市北區警察署太平町警察官吏派出所、新莊郡營盤警察官吏派出所、臺北消防組、草山溫泉；24日：總督府文教局、中央研究所工業部、殖產局、臺北帝大、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臺北市北區警察署、中央研究所、專賣局、臺北屠場。³⁰

有關此次考察活動的主要動機目標，由省主席陳儀在《臺灣考察報告》一書撰寫的序文內容，可明白得知，其曰：

人類生活所以能日見進展者，即在其知識之能蓄積與傳播……因此蓄積與傳播之結果，而知識遂超出國界，形成世界知識。……我國為開化最早之國家，無論形上知識或形下知識，所貢獻於世界者實非淺鮮，但現在亦亟須輸入世界知識，以改進自己之生活。此次組織臺灣考察團，派赴臺灣考察，即欲輸入關於各種建設上之知識，藉為閩省建設之考鏡也。查臺灣產業發達之歷史，雖為時不久，然其發展之過程如何，所用之方法與所採之步驟如何，舉足為閩省振興產業之參考，此就縱的關係言之，有考察臺灣產業之必要一也。閩省與臺灣僅隔一衣帶水，自然之環境既同，所生之物產無異，自氣候、地質以至農林漁牧殆無一不同，臺灣前此所用以經營各種產業之方法，在在足以為吾人考證之資料。此就橫的關係言之，有考察臺灣產業之必要二也。今考察業務經已終了，並出考察所得輯成一書，名曰臺灣考察報告。內分二十一章，舉凡米稻、甘蔗、製糖、園藝、茶業、林業、水利、農林機關、漁牧、電氣事業、鐵道、專賣、土地整理、財政、警政、教育、衛生以及癩瘋病治療、鴉片等，無不悉心記述……擬盡其力

³⁰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頁7-15。

之所及，將此次考察結果，擇其適合於閩省者，次第見諸實行。³¹

另外，建設廳長陳體誠在該書總論中，簡要歸納了日本領臺四十年「農工商業均有驚人之進展」，而臺灣的繁榮主要歸功於「農業之發展」，至於農業的發展則主要因為生產事業的「合理化」與「統制」。前者指各種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的創設、試驗成果的有效推廣；後者則指農業合理化發展的過程中，主要依賴強有力的臺灣總督府等行政機關各種「統制政策」的領導與促成，其並強調總督府「事權統一、職責分明」，可為中國各省施政之參考。³² 而本書的編輯陳文濤則在〈書後〉一文，進一步撰寫編輯心得，主張臺灣經建發展的成功，主要在於「資產化」與「技術化」兩個原因。他認為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官方與民間在臺灣投入了大量資本以發展技術，從而促成臺灣各項產業的快速發展，且總督府的各项補助與獎勵發展政策，尤扮演了重要影響。³³

事實上，福建農政專家與主管官員所撰寫的臺灣農林產業與農政之考察報告書，均如前述陳體誠與陳文濤的歸納一樣，就個別產業與經建項目，詳細說明了日本領臺以來，臺灣總督府如何透過相關政策投入資本促進技術發展，從而促成產業的快速發展。

以下透過米作、蔗糖業、茶業、水果業（園藝）、林業與農林機關等六個項目的考察報告，來說明福建農政專家與官員的主要考察心得。首先陳振鐸在〈米及稻作〉報告中，即分三部分說明了臺灣米與稻作發展歷程，第一部分，以統計數字說明臺灣稻米生產的面積、產值與出口狀況，強調日本領臺以來在耕作面積擴張、產量增長與品質改良上的驚人發展。第二部分，說明過去臺灣總督府的各種農業試驗機關與農政機關，如何針對稻作生產推動各項改良計畫，包括稻種改良特別計畫、稻作改良特別計畫、稻作改良附帶獎勵事業（含水稻二期栽培之獎勵、共同秧田、密植之獎勵、拔稗之獎勵、綠肥之獎勵、病蟲害之防除、肥料之共同購買、農業倉庫、農業倉庫米共同販賣所、米穀檢查、蓬萊米之獎勵、佃農制度之改善、農業基本調查）。第三部分，則說明總督府規劃的未來二十年稻作改良增殖計畫，包括振興水利改良土地擴展耕作面積、研究品種改良、改善耕種法、事

³¹ 陳儀，〈福建省政府陳主席序〉，收於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頁1-2。

³²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頁16-27。

³³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頁456-463。

業成果的預測等內容。³⁴

其次，如楊著誠在〈甘蔗〉一文，則同樣先透過統計數字說明了臺灣甘蔗生產的重大進展，然後分別就栽培、肥料、品種改良、灌溉排水設備創設、病蟲害防治等方面的進展。而岑如森在〈糖業〉一文，則詳細說明總督府如何透過糖業獎勵規則、原料採取區域之限定、蔗苗取締規則、蔗苗養成所、糖業試驗所之設立、砂糖製作、糖業概況等面向，說明總督府在發展製糖業的主要政策規劃與發展成果。³⁵

其三，如張天福在〈茶業〉一文，則分從茶樹的品種及產地、茶樹之栽培（繁殖、定植、中耕、施肥、臺刈、病蟲害、採摘）、茶用之香料作物、茶之製造（烏龍茶、包種茶、紅茶）、茶之貿易產量與輸出（貿易、產量、輸出）、茶之試驗事業等層面詳細說明臺灣茶業的發展歷程。強調臺灣茶業雖然移植發展自福建，但福建茶業因「人民固守成法，不講改良之方，政府缺乏獎勵與研究精神」，導致今日趨衰落；而今欲振興茶業發展之法，乃在於如臺灣一般，「設立茶業試驗場，聘請專門人才以科學方法講求栽培製造上之改良，及組織合作社以求貿易上之改良」。³⁶

其四，楊著誠在〈園藝〉一文，則分成三個部分討論臺灣園藝產業的發展。第一部分是香蕉產業的討論，包括香蕉的概況、香蕉之栽培、香蕉的販賣檢查的檢討；第二部分是柑橘類，包括產銷概況、柑橘類的品種與主要產地、柑橘類的栽培等的說明；第三部分，則是詳細介紹了臺灣的園藝試驗研究機關，包括柑桔栽培相關的調查研究、育成柑橘苗木分配給農民、溫帶果樹品種試驗、果樹標本園的經營、果樹園的覆蓋綠肥作物等面向的討論。³⁷

其五，李先才與林禮銓的〈林業〉一文，則分成八個部分討論臺灣林業的發展。第一部分，說明臺灣林業行政的變化，包括林務機關的變遷、保安林的編入、林野取締與森林管理、林業經營等面向；第二部分則是森林施業基本的調查與計畫，包括土地與林野調查、林野整理、森林調查、森林治水調查、施業案的編成；第三部分是造林，包括民營造林、官營造林事業的說明；第四部分，造林事業的補助獎勵，包括民營造林的獎勵監督、苗圃事業的補助、其他造林的補助；第五

³⁴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頁 26-54。

³⁵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頁 55-81。

³⁶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頁 100-126。

³⁷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頁 82-100。

則是砍伐與林產，有砍伐事業與林產及用材需給狀況的分析；第六則是林業團體，有臺灣森林會與林業組合的解說。第七部分則是林業試驗，包括殖育試驗、利用試驗、植物調查、行道樹與觀賞植物的試驗及調查的討論。最後部分則是林業教育，包括農事試驗場、殖產局、實業學校、臺北帝大農林專門部、各大學演習林等相關機關的林業教育的解說。³⁸

最後，是林紹誠的〈農林機關及農會〉一文，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臺灣的農林機關，包括隸屬於總督府的殖產局（內設特產課、農務課、山林課等六課與植物檢查所等各所）、中央研究所（內設種藝科、農藝化學科、植物病理科、應用動物科、畜產科、林業部與林業試驗支所等）、糖業試驗所（內設育種科、耕種科、製糖化學科、農藝化學科、病理科、昆蟲科等）、營林所（內設庶務、作業、造林三課）；至於地方州廳則設有農事試驗場，負責農產的改良增殖與農事的模範、調查、設計、講習、諮詢等事項，各州廳郡內並設有勸業課，負責農事行政，並監督農會的運作，另有州立農業傳習所，負責農村中堅篤實農家的教育養成。第二部分，則介紹農會組織，臺灣農會最早在1900年創設，其後如雨後春筍相繼萌生，最初僅為任意團體，其後總督府制定農事規則等相關法規，賦予農會法人資格，並指導其協助各種農業行政與推廣發展事宜；各地農會主要工作為協助本地農業調查、研究、試驗、改良、獎勵、調解、仲裁等。³⁹

結束這一考察活動的說明前，應該交代的是陳體誠帶領的這一考察團，同時面臨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臺灣官方不斷大肆宣傳此行為中日親善的表現，⁴⁰ 另

³⁸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頁127-169。

³⁹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頁205-216。

⁴⁰ 參見這個時期《臺灣日日新報》的大量報導，〈臺灣實業考察團 福建で組織 省政府が三千元補助 今月中旬に出發〉（1934年11月9日，夕刊第2版）、〈福建之臺灣考察團 一行廿一名本日抵北 長官局長招宴期定 十五日官民廿四日華僑歡宴〉（1934年11月14日，第8版）、〈臺灣考察團を迎へ 早くも歡談爆笑！ けさ盛京丸船上 和氣霽霽の親善風景〉（1934年11月15日，夕刊第2版）、〈福建之臺灣考察團 十四日安抵臺北 歷訪督府領事館受長官招宴〉（1934年11月15日，夕刊第4版）、〈福建省のお客 臺北市内視察 正午、郭總領事の招宴〉（1934年11月16日，夕刊第2版）、〈考察團視察新莊柑園後 臨臺北華僑茶話會 官民合同開歡迎會〉（1934年11月17日，夕刊第4版）、〈籌歡迎福建視察團 由嘉義中華會館主催 得市及官民有志後援〉（1934年11月18日，夕刊第4版）、〈福建考察團 視察南高 赴鷺鑿鼻〉（1934年11月18日，夕刊第4版）、〈福建視察團來屏〉（1934年11月19日，第2版）、〈福建考察團 視察嘉義 翌日登阿里山〉（1934年11月22日，夕刊第4版）、〈福建考察團 きのふ歸北 陳團長外九名 は角板山へ〉（1934年11月24日，夕刊第2版）、〈水利農業大有利民 深謝官民好意 考察團之感想〉（1934年11月24日，夕刊

一方面也面臨福建內部的賣國質疑。因此在行程一開始，就發表聲明書向各方表明：考察團不涉政治，僅關於技術方面的視察。聲明書言：

福建歷年內亂，建設事業阻礙。幸近來土匪漸次肅正，政治已入軌道，福建人民深望建設實現。余為福建人，主管本省建設事業，深愧學殖淺陋……乃與政府及社會人士，希望建設福建者聯合，組織考察團，參觀臺灣。團中人士，皆屬專門家，強半曾遊歷日本，或曾留學。此旅行目的，在乎考察臺灣產業，故命名臺灣產業考察團。團員及余，乃技術人員，故不關係政治，專心致力技術之事。……歸閩後就臺灣建設技術成績貢獻於福建政府當局及人民，若我福建於短日月，得以振興農工商業各方面事業，則福建人民，所得誠大也。⁴¹〔按：底線為筆者所加〕

儘管如此，福建民間的賣國質疑仍很激烈，考察團回國後從廈門經陸路返回福州途中，在仙遊縣遭到大部隊的匪徒襲擊，幸好福建保安第九團部隊馳援始得無事。經查匪徒襲擊原因為以為陳體誠考察團一行，「欲將福建省，賣與日本」。⁴² 由此亦可見陳儀等人推動經建學臺灣，在福建社會內部抗日氛圍下所承受的質疑壓力。

（二）1935年10月間省主席陳儀帶領的第二次考察團

1935年10月到11月間臺灣總督府為配合臺灣始政四十週年，並向國內外誇耀臺灣統治的成功，舉辦了大規模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除了大力推動臺灣與日本民眾參觀外，更配合南進政策的推展，積極邀請中國各界，尤其

第4版)、〈臺灣と福建の連絡問題で會談 小濱長官代理と陳團長が 福建考察團最後の日程〉(1934年11月25日，夕刊第2版)、〈臺北華僑歡宴考察團 極稱臺灣施設完善 一行廿五日朝離臺舉親善效果〉(1934年11月26日，第8版)、〈考察團離臺聲明書 中國進展要賴協助 官民亦須時常過從〉(1934年11月28日，夕刊第4版)、〈福建考察團廈門で 臺灣視察の感想發表 驚異的發達は政府の實力と 日本人の忍耐、充分な資金に依る 支那政府は人民を責めるのみ〉(1934年12月1日，夕刊第2版)、〈福建考察團抵廈門 發表視察臺灣感想 考其發達原因有三〉(1934年12月1日，第8版)、〈塚本領事 招待考察團〉(1934年12月1日，第8版)、〈考察團接待の 御禮を述べ けふ郭總領事總督を訪ねて〉(1934年12月7日，夕刊第1版)。

⁴¹ 〈臺灣考察團不涉政治 專門視察技術方面 陳團長聲明書〉，《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15日，第8版。

⁴² 〈臺灣考察團一行 歸途遭土匪襲擊 推測一行欲賣福建于日本 得保安第九團到始得無事〉，《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2月8日，第12版。

華南與南洋等地政商界人士與民眾來臺參觀。⁴³ 福建省的官民也是總督府積極邀訪的對象，此時主政福建省政府的陳儀在外交與福建省政借鑑的考量下，繼前一年底的大規模參訪團之後，亦率領 18 人的龐大參訪團搭乘逸仙軍艦來臺參觀博覽會，並進行密集的經建參訪行程（10 月 21-28 日）。

陳儀帶同省府委員林知淵、顧問李擇一等官員來臺參訪，由總督府官員、國民政府臺北領事館官員與日臺官紳多人在基隆碼頭迎接，其後前往臺灣總督府參觀，並接受總督中川健藏在官邸舉辦的歡迎宴會。陳儀此行不僅視察臺灣博覽會與其他經建設施，藉以了解與學習總督府在臺灣的各項經建學知，同時還與臺灣總督中川健藏會面推動「福建與臺灣的經濟提攜」協議，希望日本（臺灣）官紳能提供資本、技術與人力協助推動福建的省政建設。中川總督回應願意提供各項協助，除了之前因應福建省政府邀請招聘的水利技師八田與一外，也將派請米作、果樹與林業技術專家到福建協助，並同意提供福建建設所需的資金借款等事宜。⁴⁴

（三）1936 年 12 月間廈門市長李時霖帶領的第三次考察團

福建省政府委派，由廈門市長李時霖帶隊這次臺灣考察活動，考察團成員含廈門市長李時霖共 11 人，包括晉江縣長張斯馨、福清縣長毛應章、惠安縣長林鴻輝、永定縣長鍾幹丞、禾山特種區長劉際唐、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福建分會委員林炳康、廈門市工務局長劉元瓚、中央銀行廈門分行長舒石父、中南銀行廈門分行長章叔淳、廈門市政府秘書處科員鄒兆琨。考察結束後，成員撰寫的報告如下：李時霖/臺灣之衛生事業及其行政、張斯馨/臺灣鴉片制度的沿革及概要、毛應章/臺灣之農林、鍾幹丞/考察臺灣農村經濟之感想、林炳康/臺灣農會之組織及其任務、劉元瓚/臺灣之水利及灌溉、劉元瓚/臺灣之交通、劉元瓚/臺灣之電氣、舒石父/臺灣的經濟狀況、舒石父/臺灣之地租、章叔淳/臺灣的透視、林鴻輝/臺灣之糖業、鄒兆琨/考察日記。⁴⁵

⁴³ 有關這次博覽會的詳細內容，參見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主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242-291。福建省各界參觀此次博覽會的機關團體，參見使領館消息：駐臺北總領館通訊（第三、四、五號），〈（一）福建省政府陳主席來臺視察暨本館招待情形、（二）廈門市長王固磐來臺親察暨本館招待情形、（三）本館招待來臺參觀博覽會併視察文化產業各團體紀略〉。另可參見博覽會期間《臺灣日日新報》有關陳儀等福建官紳參觀活動的二十餘條報導。

⁴⁴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頁 93-98。

⁴⁵ 李時霖總編，《臺灣考察報告》，頁 58。

這個編印出版的考察報告，開頭為省主席陳儀的題字與序言：「今歲（1937）為閩省之經濟建設年，此後施政中心，實以經濟建設為先務，惟茲事體大，難期推行盡利。臺灣與閩帶水相望，不特氣候地理同也，即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如農林水利交通衛生諸端，亦復十九相似，取彼成規，供我參考，期收事半功倍之效也。廈門李市長等有鑑於此，曾往實地考察，於其各種建設事業，俱有心得，歸編報告」。⁴⁶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考察報告正文之前，更有當時中央政府與福建地方要人的題字，皆表達《臺灣考察報告》可供中國發展取鑑之意，如王寵惠、翁文灝、王正廷、顧維鈞、吳鼎昌、朱家驊、陳立夫、蔣鼎文、陳肇英、陳樹人、周啟剛、蕭吉珊、吳開先、陳景烈、高登艇、陳體誠、斯烈、鄭貞文等人。

該團 12 月 1 日從福州搭乘鳳山丸來臺，出發前在港口有廈門國民黨市黨部人員、日本細萱司令官、山田總領事與廈門市政府高級職員及廈門各界領袖歡送。12 月 2 日抵臺後開始考察，到 13 日搭船回閩，考察期間除了參加臺灣官方、民間與僑界的飲宴活動外，主要參觀行程如下——2 日：臺灣總督府、臺北市役所、三井銀行、臺灣銀行、大阪商船公司、中華總會館；3 日：博物館、臺北帝大、中央研究所農業部、中央研究所林業研究所、植物園、商品陳列館；4 日：士林園藝所、臺北州立農業傳習所、專賣局、臺北州立動物園、臺灣神社；5 日：龍潭陳姓茶樹農場、關西逢茂柑橘與茶樹農園、新竹工商獎勵館、蓮草會社；6 日：臺中市役所、物產陳列館、教育陳列館、自來水公司、虎尾製糖場；7 日：嘉南大圳、延平郡王鄭成功祠（今開山神社）、孔子廟、水產試驗場臺南支場、製鹽株式會社；8 日：糖業試驗所、臺南州立農業試驗場、淺野水泥株式會社、打狗港、食料工業株式會社、市設質鋪；9 日：宜蘭礁溪溫泉；10 日：更生院（戒煙所）、鴉片營業小賣（零售商）；11 日各自赴各機關蒐集資料、茶商公會；12 日：樂生院（癲瘋病院）。⁴⁷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個較小規模的考察活動與前述陳體誠率領的考察團考察機構與主題有很高的重疊，但透過考察成員上的比較，可以發現兩個考察團的性質有一些差異，陳體誠的考察團乃是省政府各單位主管與專家的考察，主要是作為福建省政府即將展開的各項經建改革之參考。與此相對，這次廈門市長率領的考察團，一方面是作為廈門市政建設改革的參考，另一方面則是福建各地縣長有

⁴⁶ 〈陳主席序〉，收於李時霖總編，《臺灣考察報告》，無頁碼。

⁴⁷ 李時霖總編，《臺灣考察報告》，頁 58-68。

關農村農政改革的參考。

若不討論考察報告中有關衛生事業與鴉片制度部分，僅就有關農林、農會、農村經濟、糖業、水利、交通、電力等各篇考察報告的內容來看的話，可以發現這個考察團的報告相對較為簡略，但其主要的報告要點，則與前述陳體誠等人的報告類似。首先，毛應章〈臺灣之農林〉、鍾幹丞〈考察臺灣農村經濟之感想〉、林炳康〈臺灣農會之組織及其任務〉、林鴻輝〈臺灣之糖業〉、章叔淳〈臺灣的透視〉等文章，都是說明總督府如何設立各種產業試驗所，藉以獎勵、補助各項產業的研究試驗，並透過各級農政機關與農會等組織，來推廣各項產業技術與發明，從而促成臺灣產業與農村經濟的發展。其次，劉元瓚〈臺灣之水利及灌溉〉、〈臺灣之交通〉、〈臺灣之電氣〉三篇報告，則說明了總督府在水利、交通、電力等方面的投資與發展，如何建立各項產業發展所需的基礎建設，從而能配合各項農政建設，促進臺灣產業的快速發展。⁴⁸

四、1935-1937 年間臺灣官方的福建考察活動

學界廣泛注意到前述 1930 年代中期福建省政府的臺灣考察活動，但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的是，同時期臺灣總督府的農政專家官員也應邀到福建進行相關經建與農政考察活動，並留下相關考察報告，可從中窺見相關考察狀況者有兩次重要的考察交流活動。一是 1935 年 8 月到 9 月間，臺灣嘉南大圳規劃者、著名水利工程專家八田與一，⁴⁹ 前往福建進行水利與土地視察；二是 1937 年 2 月到 4 月間，臺灣農業與水利專家磯永吉、荒木安宅、上野忠貞、櫻井芳次郎、徐慶鐘等人較大規模的福建農林視察活動。

(一) 1935 年 8 月至 9 月間總督府水利專家八田與一的福建視察

八田與一是在福建省政府透過臺灣總督府的邀請下，前往福州考察當地的水利工程事業。他在 1935 年 8 月 16 日從基隆出發前往福州，到 9 月 11 日返臺，

⁴⁸ 李時霖總編，《臺灣考察報告》，頁 1-57。

⁴⁹ 有關八田與一在臺灣參與水利工程的完整經歷，參見陳鴻圖，〈第三章 施展抱負：八田與一及其在臺灣的水利試驗〉，收於陳鴻圖，《人物、人群與近代臺灣水利》（新北：稻鄉出版社，2019），頁 71-96。

考察時間長達 4 週。他在福州期間考察了閩江的水利狀況，發現閩江流域的田地不僅灌溉設施不足，而且缺乏防洪設施，水利條件不佳，對於農業生產妨礙很大。而當時福建省政府為了改善福州地區閩江流域的水利條件，正規劃在過去曾修築水利設施的長樂縣蓮柄港，重新修築大規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因此乃委任八田與一到福州提供具體的建議。⁵⁰

有關這個考察活動的報告資料，目前能找到的僅有兩篇八田與一自己撰寫的相關文章，第一篇是有關福建土地改良的視察報告書，該文主要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福建農業發展的一般性建議，他依照各地考察的心得，指出福建各縣如果透過山腳地帶蓄水池的修築、河川整理、海埔地的開拓、現耕地的土地改良，並配合品種改良、肥料運用、收穫保存等農事改良，很容易就可以增加現有的農業生產。另一方面，若透過養魚、畜牧、植林、園藝等多角化農業的獎勵，農民收入必將增加，購買力將能提升，都會就會跟著繁榮，如此一來為了提升本省的文化生活，將會需要從他省或者他國移入輸入各種商品，從而他省與各國也會從本省移出輸出各種商品。

他並進一步說，福建省山多，應該獎勵植林，鼓勵福州杉等各種林木的輸出移出，並發展石材、黏土、木材等加工品以及礦產品的生產與原料等的輸出移出，相信應該可以與各種他省與外國商品的輸入移入互相抵消。而以上這些資源的開發基礎，有賴於各種地形測量圖、地質圖的調製、雨量的觀測、林業農業畜產水產試驗場（各試驗場必須附設初等專門農業學校，提供實務的農業教育，並讓其回到農村引領啟發農業生產）的籌設。另外，本省的電力若經開發的話，電費將相當便宜，適於獎勵發展化學肥料工廠。同時，跟工業比起來，農業收益甚薄，因此政府對這些設施有必要進行適當的補助，透過設立殖產銀行或者發行政府債券等來提供長期的低利貸款。

而在第二部分，他則以詳細問答的方式，對福建省政府提出的各種福建省水利設施問題，提供詳細的建議。首先，他建議土地改良工程應該由福建省政府總其成來作，並建議福建省政府應如何透過稅收的方式籌集土地改良所需費用，以及利用土地改良成功後的土地賣渡方式回收資本。其次，他針對長樂縣蓮柄港灌

⁵⁰ 有關長樂縣蓮柄港水利工程的修築計畫，參見〈長樂縣蓮柄港田灌溉復興工事〉，收於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譯，《福建建設報告（第 2 輯）》（臺北：該部，1938），頁 41-53。

溉工程第一與第二灌溉區的個別修築問題，分別提供了建議。第一灌溉區的問題，包括港道應該如何修築、桃枝湖應該廢止還是保存、應不應該設支線、是否應該設小給水口、水費應該怎麼收等提出了詳細建議。第二灌溉區的問題，包括幹線應否延長、與第一灌溉區鄰近土地的港道應否遮斷、第一灌溉區與第二灌溉區水量與水費分配問題、將來第二灌溉區如果擴張的話應該如何規劃、這次的新幹線雖然可能發生漏水等問題，但兩、三年後固定後應該就不會發生這種問題、溪流與山腳下排水不充分處可能發生漏水問題應注意。

第三部分，他針對視察過的六種土地：谷地、山腳地、丘陵地、普通耕地、海埔新生地、沼澤地等，一一提出水利修築方法的建議。同時他也針對鹽田、養魚、畜產、林產、園藝、礦業與水力發電等水利工程問題，提供了建議。⁵¹

除了有關福建土地改良一文外，八田與一在考察結束後，也根據四週的福建考察經驗，對中國政治現況與福建省的整體社會狀況與發展提供了一個簡要的觀察紀錄，發表了〈福建管見〉一文。從該文可以窺見他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的看法。⁵²

（二）1937年2月至4月間總督府農政專家磯永吉等人的福建視察

這個視察團的成員包括在臺灣改良蓬萊米種植成功聞名的農業專家磯永吉（臺北帝大教授兼任臺灣總督府技師）、水利專家荒木安宅（總督府技師）、林業專家上野忠貞（總督府技師）、園藝專家櫻井芳次郎（總督府技師）、農業專家徐慶鐘（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等人。這個考察活動的報告《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一書，相當完整地記載了考察活動的內容。⁵³ 另外，個別專家考察結束後，

⁵¹ 八田與一，〈福建省土地改良其の他に關する視察報告書〉，《臺灣技術協會誌》（臺北）1:2（1937年3月），頁113-118。

⁵² 八田與一，〈福建省管見〉，《臺灣の水利》（臺北）184（1936年1月），頁7-17。另有內容相同但標題不同的一文，參見八田與一，〈福建省視察〉，《臺灣技術協會誌》1:2（1937年3月），頁86-96。

⁵³ 臺籍專家徐慶鐘雖在考察報告中正式列名為五人考察團中的一員，但考察報告活動並未特別交代其活動，其為臺北帝大磯永吉等人的學生，此行可能主要擔任協助與翻譯的任務。徐慶鐘從1933年起在《臺灣農事報》發表了有關臺灣稻作、黃麻、棉作、小麥等議題的十餘篇研究成果。他在1945年取得臺北帝國大學博士學位，是第一位臺灣本土的農學博士，戰後被陳儀拔擢為臺灣長官公署參議兼土地委員會專門委員，1947年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農林廳長，被認為對戰後臺灣農業經濟改革有重大貢獻。徐慶鐘也是李登輝在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讀書時的老師。參見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籌備會編，《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論文集》（臺北：該會，1967）；〈徐慶鐘〉，「維基百科」網頁，下載日期：2017年10月7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6%85%B6%E9%90%98>。

也發表不少研究報告可供參考。⁵⁴

磯永吉一行行程主要如下：2月23日從高雄出發；4月16日離開福州。在這期間，除了偶與福建省府、各縣政府官員、學者專家和日本領事館等人員午宴或晚宴，並扣除幾天風景地的參觀時間外，實際的參訪行程將近三十天以上，他們馬不停蹄、但也仔細地參觀了福建各地的農政機構、重要民間農場、農業與水利工程。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為了提供給福建官方具體的農政規劃建議，還花費近十天時間仔細進行調查事項的整理與討論，與福建省官員專家進行了詳細會談並解答其有關農政上的種種問題；此外，他們還在總督府的邀請下，舉行了好幾次的對外公開演講活動，向公眾說明臺灣農政的改革經驗與福建農政的改革方向。

參觀地點包括：禾山區洪山柄葉清和果園、海軍農事試驗場、高林地方農林水產業、上水道水源地、臺灣出身林木土農園與畜舍、福建省農產競賽會、漳州南門外柑橘園/荔枝園/水仙栽培、漳州縣宅內農場、浦南柑橘生產地、漳浦縣建設廳漳浦農場、同安縣立林場苗圃、莆田縣立林場苗圃、福州電氣公司、福建省農林改良總場福州林場、福建省農民教育師資訓練所、福州近郊苜蓿栽培調查、福建協和學院/精米所/馬鈴薯栽培地、南嶼教育團公有林/柑橘園、福州電氣公司科貢農場/石倉農場、長樂縣灌田局、長樂林場、訪問郁達夫、螺州柑橘園、協和職業中學校、山州甜橙園、製材工場、製紙工場、鳳裡崗園藝地、浦裡水利狀況、福州杉造林地、伐木所、何家碧林園、建設廳附屬柑橘儲藏庫、閩江修濬工事、農民師資訓練所不良水田改良耕地整理計畫地、福州電氣公司發電所/製冰工場/倉庫/鐵工場/製粉工場、福州電話公司交換所、福州東門合成農場果園。⁵⁵

⁵⁴ 如磯永吉，〈農作物より見たる福建省〉，收於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南支産業に關する講演集〉（臺北：該部，1938），頁33-37；磯永吉，〈福建省の食料作物の改良に就て〉，《臺灣技術協會誌》1:4（1937年7月），頁259-264；荒木安宅，〈福建省の水利〉，收於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南支産業に關する講演集〉，頁27-30；荒木安宅，〈福建省の耕地と水〉，《臺灣技術協會誌》1:4（1937年7月），頁265-271；荒木安宅，〈福建省の農業水利〉，《臺灣の水利》8:3（1938年6月4日），頁87-92；上野忠貞，〈福建省の林業〉，《臺灣技術協會誌》1:4（1937年7月），頁272-282；櫻井芳次郎，〈福建省の園藝に關する調査〉（臺北：南洋協會臺灣支部，1937）；櫻井芳次郎，〈臺灣と南支の果物〉，收於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南支産業に關する講演集〉，頁16-26。

⁵⁵ 〈旅行略記〉，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臺北：該團，1937），頁99-103。本文使用版本取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下載日期：2016年4月1日，網址：<http://rarebook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99/index.htm>。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參觀行程中，福建各地陪同與會談的官員與專家，很多都是曾經參與過兩次臺灣考察活動的人，而這些參觀的農政機構與設施，很多其實都是陳儀上任後參照臺灣考察經驗剛籌建的，顯然陳儀希望有效利用來訪的機會，促成福建官員專家與臺灣專家進一步的交流機會，並希望其提供新設農政機構與設施的相關建議。⁵⁶

而除了導覽參訪過程的交流外，更重要的是福建官方還安排了專門的幾天時間，針對具體農政與農業技術的問題，請實地參訪過福建農政後的臺灣專家們提供建議。這些問題可粗分成三類：一、對建設廳長有關福建建設計畫問題的回答、二、對地方農政機構參訪的報告與回答、三、對各視察地的建議意見。

第一部分建設廳長問題的回答包括：1、建設廳農林試驗場計畫與系統，2、試驗場與職業學校的聯繫，3、農民教育師資訓練所及縣農業推廣所之計畫，4、水稻品種之普通改進及推動方法，5、種麥計畫，6、種植棉苧麻計畫，7、柑橘生產改良統制計畫，8、柑橘儲藏庫之設置與經營方法，9、土壤測定反肥料管理計畫，10、造林之實施法（苗圃、荒山所有權、強制獎勵），11、長樂灌溉區之耕地整理及排水計畫，12、閩江、南台島及沿江之灌溉排水計畫，13、菸葉改良計畫，14、甘蔗品種改良計畫。⁵⁷

第二類問題的回答包括：1、龍溪縣宅內農場問答，2、提供給龍溪縣縣長的報告，3、教育廳公有林之問題的回答。⁵⁸ 第三類問題的回答包括：1、對禾山區農林業的意見（海軍農事試驗場、葉清和果樹園、禾山區蔗作、養魚池防風林），2、對漳州到漳浦沿線造林的意見，3、對漳浦農場的意見，4、對同安縣立林場的意見，5、對莆田縣立林場的意見，6、對建設廳農林改良總場福州林場的意見，7、對農民教育師資訓練所的意見，8、對教育團公有林的意見，9、對電氣公司科貢及石倉農場的意見，10、對協和學院園藝研究的意見，11、對協和職業中學校的意見。⁵⁹

⁵⁶ 以上提及的參觀地點，除了部分民間農場與公司外，多數的公有農業試驗場、林場、苗圃、果園與農業教育機構以及農產競賽會，都是陳儀主政以來在其行政與財政改革的配合與支持下所創設或擴充建置的。詳細參見福建省政府編，《閩政叢刊 18：福建省之農林》（福州：福建省農業改進處，1939）。

⁵⁷ 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1-36。

⁵⁸ 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36-50。

⁵⁹ 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51-62。

藉由這些書面報告，筆者發現儘管少數技術性問題，磯永吉等人表示因為考察時間不足、調查所得資訊不夠，無法提供適當建議，但對多數問題，則提供了詳盡的回答。磯永吉等人不僅指導福建省建設廳建設計畫的應有作法，包括法規應該如何制定；而且針對農業品種培育等問題，直接提示將寄贈專門書籍以供參考，也表達了如何參考臺灣的經驗以解決問題，並表示將贈送臺灣的各種作物種苗以供試驗。而對於水利工程的部分，除了提示技術上應該如何進行外，還包括建議如何籌措資金等。

另外，參訪後期磯永吉等人還在福建省立科學館與農民教育師資訓練所分別發表了幾次演講。在省立科學館的演講，有磯永吉的〈臺灣農業之發展與所見、福建省農業現狀之感想〉、荒木安宅〈農業水利問題〉、上野忠貞〈對林業之感想〉、還有櫻井芳次郎的〈臺灣園藝事業之發達與所見、福建省園藝發達之感想〉等。而在農民教育師資訓練所的演講，則有磯永吉〈臺灣稻麥作之改良〉與櫻井芳次郎的〈果樹的改良〉。

首先，磯永吉在省立科學館的演講，主要介紹了臺灣農業發展的歷程，並對福建省的農業現狀發表感想，強調福建面積為臺灣3倍以上，氣候、風土相似之處甚多，只要按照臺灣經驗，「用科學力量，以開發農林業」，「產業之花必能燦然瀾漫而開」。而在農民教育師資訓練所的演講，則比較專門，詳細介紹了臺灣米、麥改良與肥料利用的技術問題進展，並對福建的農業技術試驗提供示範建議。⁶⁰

荒木安宅則介紹臺灣總督府如何先後發布臺灣公共埤圳規則、公共埤圳組合令、官設埤圳規則、官設埤圳組合令、臺灣水利組合令、臺灣水利組合規則等法令，來管理臺灣既有水利事業並大量修築新型水利事業，促成臺灣水利事業的發達。並提及從地質上看，福建現在最容易推行的農業水利是利用地下水，而要追求農業水利的發達，首先就是要養成農業水利的技術人才，並配合政策來推進。⁶¹

上野忠貞有關林業的演講，則強調林業是百年大計，須要長期規劃，發展不可求快。並提到都市植樹、林業植木管理應該如何進行。同時強調林業不可單由經濟方面

⁶⁰ 磯永吉，〈臺灣農業之發展與所見、福建省農業現狀之感想〉，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63-67；磯永吉，〈臺灣稻麥作之改良〉，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79-92。

⁶¹ 荒木安宅，〈農業水利問題〉，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68-69。

著想，最重要的是要保守國土、治山治水，其作為各種產業的母體，對於工業原料供給、農業水利、水利發電等都非常重要。最後還提及福建林產發展的應有方向。⁶²

最後，櫻井芳次郎在省立科學館的演講，主要介紹臺灣香蕉、鳳梨、柑橘等園藝產業的發展。並根據臺灣經驗對福建的園藝，尤其非常適合發展的柑橘產業提出建議，包括：1、實行品種試驗，2、豎立輸出防遏方策，3、獎勵山地之栽種，4、徹底預防並驅逐病蟲害，5、勵行接木增殖，6、研究肥料管理，7、柑橘貯藏庫之完備，8、輸入包裝容器之改善，9、柑橘合作社之積極的援助及促進。而在農民教育師資訓練所的演講，則專門從技術面說明果樹栽植的問題，首先提到果樹改良必須要科學家與專門栽植的實際農業家的合作；並強調農政機關應該收集國內外的品種進行試驗，且應推廣接木技術；也介紹了交配雜種的品種改良方法；最後提到福建柑橘栽培的堆土栽培與樹幹高度等技術問題。⁶³

另外還應注意的是，臺灣參訪團的福建農政參觀心得，不僅止於前述提到的這些視察報告書的內容，那些內容體現的僅是他們提供給福建官方與民間的可公開心得與看法。如果進一步分析荒木安宅與櫻井芳次郎等人，以日文發表的福建考察心得之演講與文章，則可讀到一些不同的訊息。如荒木安宅 1937 年戰前有關福建水利的一個演講裡，就對中國與福建的政治多所批判，並認為福建省政府缺乏財政能力且國家權力薄弱，因此大規模的水利設施計畫在完成上恐有困難。他甚至對於當時臺灣總督府打算貸款給福建省政府進行大規模水利建設的提議表示質疑，認為工程完成後省政府可能難以要求受益農民繳納應有的水利租稅，而因為主權問題，又不可能要求撥付一部分改良土地作為貸款返還代價，因此提醒總督府應該仔細考量，並另行規劃適當還款方案。⁶⁴ 而在戰爭爆發後的另一篇有關福建農田水利的文章，則明白表達出其對福建的帝國主義心態，他提到雖然福建省政府沒有能力完成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但幸好因為中日戰爭爆發，將來依賴日本的力量與技術，相信將能夠解決這些問題。⁶⁵

⁶² 上野忠貞，〈對林業之感想〉，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70-72。

⁶³ 櫻井芳次郎，〈臺灣園藝事業之發達與所見、福建省園藝發達之感想〉，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73-78；櫻井芳次郎，〈果樹的改良〉，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93-97。

⁶⁴ 荒木安宅，〈福建省の水利〉，頁 27-30；荒木安宅，〈福建省の耕地と水〉，頁 265-271。

⁶⁵ 荒木安宅，〈福建省の農業水利〉，頁 89-72。

而如櫻井芳次郎則在一篇有關福建省園藝的長文裡，詳細從臺灣與福建比較的方式，討論了福建園藝的發展進程，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福建園藝產業應該如何改進的要點，雖如同他在福建演講一樣提出一些類似看法。但其在文章中，更進一步關切的是如何透過福建、廣東等華南園藝視察的機會，輸入對於臺灣園藝改良有用的水果品種、技術與啟發（如荔枝、龍眼、柑橘）；另一方面，他也非常關切福建園藝進一步發展後，對臺灣同樣類型產業所可能造成的衝擊（如香蕉、鳳梨、柑橘等），並討論應如何因應，同時暗示如果將來日本可以控制華南的話，則可透過整個產業圈的適當規劃來解決臺灣與華南園藝產業的地域性競爭問題。⁶⁶

同時，應該注意的是磯永吉與上野忠貞等福建視察團成員的考察心得，不僅是對於福建官方農政改革有用的學知，他們其實也能提供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帝國南進政策規劃的重要學知。事實上磯永吉等人回臺後，臺灣技術協會與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等機構，就邀請其一行人進行有關福建產業的公開講演，並將其彙編刊載成專書出版。對於臺灣的官方、產業與學術界來說，這些講演與出版，不僅只是純粹為了瞭解他們的福建視察心得，同時也因福建產業視察活動的經驗與知識傳播，對總督府官方南進侵略國策的制定有所助益，且對南進的政治文化宣傳也具有一定意義。換言之，雖然磯永吉等專家配合福建省政府的邀請與臺灣總督府的命令前往福建，其自身的視察或許純粹出於技術與知識交流的動機，並無刻意配合總督府宣傳南進國策的意圖，但其視察活動與後來的演講與論文，的確在總督府的南進國策的推進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⁶⁷

五、戰前臺灣福建交互考察活動對於福建省政的影響例證

前面有關臺灣總督府專家官員兩次福建考察活動的解說，已經部分顯現了臺灣經驗的確對於福建省政，尤其農政建設所產生的影響作用。我們可以進一步透

⁶⁶ 櫻井芳次郎，〈臺灣と南支の果物〉，頁 16-26。

⁶⁷ 臺灣技術協會在磯永吉等人參訪結束後，邀請他們四人進行了演講報告，他們的演講內容同時被刊載在《臺灣技術協會誌》1:4（1937年7月）。另外，南洋協會臺灣分部，也將磯永吉、荒木安宅、櫻井芳次郎，以及白鳥勝義、蔡雨澤、松永榮、工藤耕一、山本亮、田中長三郎、小田島喜次郎等人的華南產業研究成果合編成專書出版，希望促進各界對於南進政策推進所須的產業知識。參見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南支産業に関する講演集》。

過兩份資料，來看 1934 年以來福建農政的進展以及臺灣經驗的重大影響。首先，前述率隊來臺考察的福建建設廳長陳體誠曾在 1936 年間編印《福建建設報告》叢書，其中有關農林部分詳細描繪了 1934-1935 年間福建設立各種農業試驗機關，以期改良技術增進生產的經過，包括水稻、甘藷、甘蔗、茶葉、菸葉、柑橘、香蕉、鳳梨、龍眼、荔枝、畜牧、林業、水產、土壤肥料、農具製作等方面的改良與調查工作。配合前文的討論，可以發現這些農林建設計畫都是上述福建來臺考察的重點項目，而其所設立的那些農業試驗機關則基本上都是前述臺灣專家前往福建農林視察的機構。⁶⁸

其次，1939 年間福建省政府曾就陳儀主政以來的省政進展編輯了三十餘冊的《閩政叢書》，我們可以從其中有關福建農林建設的兩冊書中發現，儘管 1937 年中的戰爭爆發對於福建農政的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妨礙，但 1934-1939 年間福建農政的確有顯著進展，同時也可以看到這些農林建設的推進，主要依賴於其自 1934 年以來模仿臺灣學知所建立的各種農業試驗機關與農業行政部門。⁶⁹ 就此來說，1934-1937 年間福建與臺灣短暫但密集的交流雖然是在福建與臺灣兩邊不同政策考量下的互動結果，但這個貌合神離的合作關係，的確對於福建的省政，尤其農政近代化的推動帶來深遠的影響。

本文接著，以 1934-1937 年間兩位福建農業專家陳振鐸與張天福在稻作與茶業上的改革為例，進一步證明陳儀等人推動的這一系列考察活動，對於福建農政近代化的深遠影響。

首先，陳振鐸（1906-?），福建閩侯人，是晚清福州科甲第一家陳寶琛家族的

⁶⁸ 原叢書出版於 1936 年，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為了追蹤福建的建設狀況，曾經編譯成日文，參見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譯，《福建建設報告（第 2 輯）》。該書中共 9 篇報告，其中 7 篇報告是有關農林與臺灣考察的：〈一、福建省農林改良計畫〉、〈二、福建省柑橘改良に関する〉、〈三、福建省蔗糖調查報告〉、〈四、長樂縣農場水稻試驗報告〉、〈五、福建省北埔茶業調查報告〉、〈六、福建省茶業の研究〉、〈九、臺灣博覽會參加〉。另一方面，在另一冊福建報告叢書，我們也可以看到幾篇與臺灣專家八田與一的福建水利考察相關的建設報告：〈一、閩江改修工事〉、〈六、長樂縣蓮柄港灌溉復興工事〉、〈十、各縣の水利報告〉、〈十五、福州水道第一期計畫〉，收於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譯，《福建建設報告（第 1 輯）》（臺北：該部，1938）。

⁶⁹ 有關 1934-1937 年間福建農政建設的概況，參見福建省政府編，《閩政叢刊 15：福建省之特產產銷》（福州：福建省農業改進處，1939）；福建省政府編，《閩政叢刊 18：福建省之農林》。除了農政建設外，陳儀主政以來，在諸多省政建設上都有所推展，詳可參見福建省政府所編的 39 冊《閩政叢刊》資料。若仔細分析這些省政建設的內容，亦可發現臺灣考察經驗的影響。

一員。其父陳寶璇留學東京專門學校（今早稻田大學），伯父陳寶琛是晚清重臣、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晚年在福建提倡並創辦新式教育，並鼓勵福建青年留日求取新知。⁷⁰ 陳振鐸畢業於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農藝化學科、美國加州大學土壤學碩士。1930年開始在福州農林中學刊物《農話》發表農業研究成果，⁷¹ 其後並擔任福州電氣公司農村電化部技師，負責該公司所屬農場的農業試驗工作。

創辦於1910年的福州電氣公司是福州另一菁英家族劉家的產業，該家族與陳家一樣都從晚清開始鼓勵家族成員留學日本求取新知，並在福州等地創辦各種新式企業。⁷² 該公司為了擴大福州電力的消費，在1926年前往日本與臺灣參觀電氣化農場，並於1928年在當時福建省官方的支持下，設置農村電化部，希望農村利用電力灌溉，並開展科學化農業。其構想與初步成果受到關注，並得到當時全國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肯定。⁷³ 另外該公司，為了擴大電力消費，也參與當時福州最大水利工程長樂縣蓮柄港的修築工程，取得該水利工程的專屬供電合約，並獲得建設廳提供10萬元的貸款，負責自行籌建水利灌溉所需的電力設備之裝設工程。⁷⁴

福州電氣公司因其官方關係、各項新式產業的參與、在農業試驗上的成果，以及其對日本與臺灣產業界的認識與關係，所以陳儀、陳體誠在進行臺灣產業考察時，就同時召集了福州電氣公司董事兼經理劉愛其、總工程師鮑國寶與農村電化部技師陳振鐸三人來臺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結束後，陳振鐸就被陳體誠指派擔任新設立的長樂農場（1935年2月開設）水稻試驗的負責人，進行大規

⁷⁰ 資誠聯合會計事務所編，《傳誠：資誠40週年紀念專刊》（臺北：該所，2010），頁6、9。關於福建新式學堂的成立始末，參見劉海峰、莊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頁250-289；黃嘉康，〈近代福建新式教育推手：陳寶琛與福建教育近代化事業〉，收於周佳榮、范永聰主編，《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303-324。

⁷¹ 陳振鐸，〈福州本地稻作改良之要點（附表）〉，《農話》（福州）2：21-23（1930年8月），頁12-16；陳振鐸，〈福州之橘業〉，《農話》3：9/10（1931年4月），頁2-7；陳振鐸，〈最近日本之土壤肥料學界〉，《中華農學會報》（南京）88（1931年5月），頁25-35；陳振鐸、樓金寶、章萬榮，〈閩侯科貢鄉農事基本調查報告〉，《中華農學會報》100（1932年5月），頁97-109。

⁷² 王慶鵬，〈福州三坊七巷「電光劉」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法學碩士論文，2012）。

⁷³ 〈第二十七篇 第一章：人物傳記〉，收於台江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台江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頁861-862。關於該公司農村電氣化的業績，參見劉崇倫，〈福州電氣公司農村電化部之庶績〉，《中行月刊》（上海）3：5（1931年11月），頁97-103；梁定蜀，〈報告：福州電氣公司農村電化部事業概況〉，《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南京）9（1934年2月），頁45-51。

⁷⁴ 參見〈長樂縣蓮柄港田灌溉復興工事〉，頁46。

模的水稻試驗工作。⁷⁵ 另外應注意的是，陳振鐸不僅主持省立長樂農場的試驗工作，其後也陸續擔任了協和大學農學院、廣東中山大學與福建省立農學院的教授，持續主導了福建等地的農業教育事業。⁷⁶

接著，討論對於中國茶業復興貢獻卓著的張天福（1910-2017）的經歷，《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茶業卷》如此記載其生平：「福建省福州市人，1932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1934年前往日本考察茶葉回國後，一直從事茶葉科研和教育工作。1935年在福建省創辦福安茶葉改良場（今福建省茶葉研究所前身），同時創辦省立福安農業職業學校（今寧德地區農業學校前身），任場長兼校長。1937年引進日本紅茶機械設備，是福建由手工製茶逐步發展為機械製茶的開始……1942年在福建協和大學農學院任教授」。⁷⁷

教會學校金陵大學農學院，可以說是晚清以來在中國傳播現代美國農學知識的先驅機構，到戰前為止也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農學教育機構之一，⁷⁸ 張天福在金陵大學的學習可以說為其農學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不過，美國現代農學對於東亞茶葉的生產與研究並不能提供太多協助，因此，1932年畢業後回到福建擔任協和學院生物系助教，想要振興故鄉茶業的張天福，很自然地把學習考察眼光轉向了日本與臺灣。他在1934年向學校申請前往日本、臺灣考察茶葉生產情況，獲得校長林景潤的經費贊助，協和學院農業經濟學教授陳希誠為了推動該校剛籌設的農村試驗區工作，也有意出國考察農業經濟學，便結伴同行前往日本、臺灣進行考察。⁷⁹

⁷⁵ 原試驗報告書中文發表於1936年3月，此處引用1938年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的日文翻譯。參見〈福建省長樂農場水稻試驗報告〉，收於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譯，《福建建設報告（第2輯）》，頁38-107。另相關報告參見，〈長樂農場二十四年度報告〉，收於福建省建設廳編，《福建省建設廳附設農林機關二十四年度工作報告》（福州：該廳，1936），頁2-86。

⁷⁶ 〈陳振鐸介紹〉，「民國人物大辭典」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10月5日，網址：<http://www.hgz.net/zhuanti/72800.html>。

⁷⁷ 參見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編輯部編，《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茶業卷》（北京：農業出版社，1988），頁324；〈張天福簡歷〉，收於林光華編著，《茶界泰斗：張天福畫傳》（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6），卷首，無頁碼。

⁷⁸ 1952年後金陵大學農學院被併入南京農業學院，有關金陵大學農學院與中國農業近代化的關聯，參見張劍，〈金陵大學農學院與中國農業近代化〉，《史林》（上海）1998:3，頁79-90；胡茂勝、曹幸穗，〈金陵大學農學院與中國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農業考古》（南昌）2010:1，頁384-388；南京農業大學編，《南京農業大學發展史：歷史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2），頁117-224。

⁷⁹ 林光華編著，《茶界泰斗：張天福畫傳》，頁19-21。

張天福考察結束後不久，在同年陳體誠等組織臺灣產業考察團時，就因此經歷被遴選為考察團成員，負責臺灣茶業之考察，考察結束後並負責撰寫臺灣茶業的調查報告。⁸⁰ 他並因此被陳儀、陳體誠等賞識，指派其籌設福建省立福安職業學校與福建省建設廳福安茶業改良場並擔任校長與場長（1935-1939），專門負責福建的茶業研究與產業振興工作。⁸¹ 在陳儀與陳體誠等福建省政府官員的農業政策與機構的支持下，張天福得以進一步發展其從日本與臺灣考察所得的學知，並貢獻於福建與中國茶業的復興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張天福雖然極力學習日本與臺灣學知希望振興福建茶業，但他本人其實有非常明確的民族主義與抗日意識，曾發表〈國難與國術〉一文，嚴厲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鼓吹提倡國術於軍警、學校與全民，以引起民族思想，使人人都可自衛，個個都有尚武精神，以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⁸² 而在另一篇福建茶業的文章中，除了主要討論應該如何改良茶業並推動職業教育之外，也在文中指出閩茶在世界市場衰落的主因，就是被日本與臺灣等地的茶業發展所取代，更痛批日本帝國主義在九一八事變後，透過滿洲國的關稅政策進一步壟斷了東北的茶葉市場，擠壓了福建茶葉的銷售市場。⁸³

此外，陳振鐸與張天福都曾在福建協和大學農學院任教（陳振鐸 1940-、張天福 1942-1946），而這個戰前福建省最重要的農業高等教育機構，其實是在省主席陳儀的經濟補助與大力支持下於 1936 年創設的。一開始創辦了農學與農業經濟兩個科系，聘請了國內外農業專家，並招收學生開始教學與研究工作。同時也創辦了園藝試驗場、園藝加工研究室，擴充農藝、森林、畜牧、植物病蟲害等面向的農學研究，以及農村服務試驗區等農業教育推廣工作。⁸⁴

⁸⁰ 該報告除收於福建省政府編印之《臺灣考察報告》，頁 100-126，也以〈臺灣之茶業〉為名發表在《協大學術》（福州）3（1935 年 8 月），頁 1-24。

⁸¹ 張天福擔任 1935 年 7 月創設的福安茶業改良場的工作成果，參見張天福，〈福安茶業改良場二十四年度工作報告〉，收於福建省建設廳編，《福建省建設廳附設農林機關二十四年度工作報告》，頁 175-260。

⁸² 張天福，〈國難與國術〉，《協大學生》（福州）1933: 9，頁 6-8。

⁸³ 張天福，〈改良福建茶業與職業教育的實施（附圖表）〉，《安農校刊》（福安）1:2（1937 年 1 月 1 日），頁 8-14。有關臺灣包種茶在滿洲國建立後對東北的大量出口，參見林滿紅，〈中日關係之一糾結：1932 至 1941 年間臺灣與東北貿易加強的社會意涵〉，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該所，1996），頁 514-515。

⁸⁴ 協和大學農學院創設歷史，參見〈協和大學農學院概況（附表）〉，《協大農報》（邵武）2:2（1940 年 4 月），頁 153-166；黃濤，〈大德是欽：記憶深處的福建協和大學〉（福州：福建師範大學歷史學專業博士論文，2007），頁 75。

六、結論

前面提到 1931 年東北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各地，包括福建官方（十九路軍的領導階層）以及民間菁英與學生都興起了激烈的抗日運動。1934 年初，正當日本中央政府為了解決滿洲問題，由華南各領事館文武官員與臺灣總督府等機關對福建等地方政機關推動積極的南進政策之時，閩變後擔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在中央政府的授意下，改變之前福建官方的對日態度，積極回應臺灣總督府的南進政策，開始了一系列的臺灣福建互訪活動，希望借鑑日本治臺經驗，推動福建省政的近代化。

前文也指出陳儀在戰前 1934-1937 年間兩岸親善交流政策，如同同時期蔣介石中央政府的對日政策一樣，遭到福建與各地民間菁英，尤其左派學生的嚴厲質疑與漢奸批判。但應注意的是，留學日本的陳儀雖被稱為親日派，但實際上應說是知日派，他雖與臺灣總督府展開密切交流，但並非不知總督府的南進侵略意圖，也非真心親日。事實上，陳儀主政下的福建省政府與臺灣總督府是一種同床異夢的合作關係，他一方面希望透過與總督府的互動敷衍，減緩其南進侵略的急進做法；另一方面，更應注意的是陳儀的確真心認為日本治臺經驗是福建省政近代化的範本，並積極透過臺灣總督府學知技術與資金等引進，推動福建省政的近代化，並可藉以為抵抗日本南進侵略進行備戰準備。

本文並以主導福建農政發展的陳振鐸與張天福兩人為例，說明這兩位密切參與來臺農政交流並對日本農業學知多所涉獵的農政專家，如何在考察結束後在福建分別推動了稻作與茶作農業的發展，藉以說明戰爭前夕這幾年間兩岸密切的經建與農業交流對於福建省政發展的深刻影響。

最後還應注意的是，戰前陳儀等福建省政官員與學者和臺灣的交流經驗，不僅對福建省政近代化產生正面影響，在 1944 年 4 月間中日戰爭快結束前，蔣介石的中央政府也因此委任陳儀擔任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其主導延攬過去主政福建時的官員與時在大陸的許多臺籍菁英擔任調查委員。該委員會對當時日治下臺灣的經濟、政治、民生、軍事等各方面作出頗為詳細的調查，並負責規劃國民政府對臺灣的光復接收計畫。戰爭勝利後，陳儀獲派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負責從日本手中接管並統治臺灣，其主持閩政期間的許多福建官員與學者，因此也跟隨其來臺參與臺灣接收與治理的工作。⁸⁵

⁸⁵ 有關臺灣調查委員會的組織與調查內容，參見近藤正己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戰前與臺灣密切交流並

如前文提及的陳振鐸戰後即跟隨陳儀來臺，奉派參與國立臺灣大學（原臺北帝國大學，以下簡稱臺大）農學院與臺灣省立農業試驗所的接收工作，長期擔任臺大農業化學系系主任（1947-1971），並曾兩任臺大農學院院長，對於戰後臺灣的農業研究作出了很多貢獻。⁸⁶ 另值一提的是，前述曾與陳振鐸多有接觸的日籍農業學者磯永吉，戰後並未如同多數日本人一樣強迫返國，因其對臺農業的重大貢獻，政府特許其在臺大長期留任，1957年71歲才退休返回日本。他在臺大農學院留任期間，還曾與陳振鐸有些共同研究合作計畫，發表了不少研究成果。⁸⁷

而張天福與戰後臺灣的農業發展，則有另一層間接的學知交流關係。他的得意門生之一吳振鐸，福建省福安人，是福安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茶科的首屆畢業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導主任。1947年7月應臺灣省農業試驗所之聘擔任平鎮茶葉試驗分所製茶主任，其後成功培育「臺茶12號」（金萱）、「臺茶13號」（翠玉）等知名茶種，多次榮獲臺灣農業與科技獎項，有「戰後臺茶之父」的稱號。1988年兩岸開放後，吳振鐸多次回到福建探望張天福，並與福建茶界專家交流協助該地茶業的發展。⁸⁸

盛讚借鑑臺灣總督府治臺成就的陳儀，在擔任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之後，完全一反其過去說法，主張：「臺灣總督作為獨裁暴君，對臺灣同胞極盡政治上的壓迫、經濟的掠奪與教育的愚弄，境遇非常悲慘，生活如牛馬般的辛酸」。參見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頁642-655。

⁸⁶ 參見〈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沿革簡史〉，「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10月5日，網址：http://www.ac.ntu.edu.tw/zh_tw/intro/introl。另外，王念烈、張仲民等戰前福建農學院的畢業生，也隨陳振鐸來臺進入臺大農學院，參與戰後臺灣的農業教育工作。

⁸⁷ 磯永吉、陳振鐸、王念烈，〈臺灣甘藷之栽培（未完）（附圖表）〉，《農報》（臺北）2:5/6（1948年6月），頁45-59；磯永吉、陳振鐸、王念烈，〈臺灣甘藷栽培（一續）（附圖表）〉，《農報》2:7/8（1948年8月），頁7-59；磯永吉、陳振鐸、王念烈，〈臺灣甘藷之栽培（二續）（附表）〉，《農報》2:9/10（1948年11月），頁36-49；磯永吉、陳振鐸、王念烈，〈臺灣甘藷之栽培（完）（附表）〉，《農報》2:11/12（1948年12月），頁48-58。除了這些共同研究外，磯永吉個人也仍持續發表很多研究成果。磯永吉事蹟，參見「磯永吉小屋：舊高等農林學校作業室」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10月5日，網址：<http://iso-house.agron.ntu.edu.tw/iso.html>。

⁸⁸ 有關吳振鐸的事蹟，參見林光華編著，《茶界泰斗：張天福畫傳》，頁114-117；〈關於本場：歷任場長簡介—吳振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網站，下載日期：2018年5月1日，網址：<https://www.tres.gov.tw/view.php?catid=1635>。除了陳振鐸與張天福兩人外，戰前學習日本農業學知，學成後貢獻於中國福建等地農業教育，戰後又來到臺灣繼續推廣農業學知的學者，還有如王益滔等重要學者。王益滔於1920年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理科學習，1929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業經濟系。1930年回國，被聘為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教授（1934年12月初兼任農業經濟系系主任）。1932年10月出席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學會第五次年會。1935年赴日本進行考察。抗日戰爭爆發後，轉任西安臨時大學農學院教授，此後歷任廣西大學農學院教授兼院長、湖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教授、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國立英士大學農學院教授、福建省立農學院教授等職。抗日戰爭勝利後，他被聘為臺大農學院教授兼農業經濟系主任、農學院院長，培育了如李登輝等不少臺灣重要的農業經濟學者。參見李登輝為恩師王益滔論文集撰寫的序言，〈「王益滔教授論文集」序〉，收於王益滔編著，《王益滔教授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系，1991），第一冊，頁序1-2。

引用書目

《協大農報》(邵武)

《群力》(上海)

《福建民眾教育季刊》(福州)

《福建呼聲》(上海)

《臺灣之畜產》(臺北)

《臺灣日日新報》

《學生呼聲》(上海)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46-092、002-080200-00248-090、002-090200-00015-202。

臺北：國史館藏。

福建省政府編印，《臺灣考察報告》(福州：福建省建設廳，1935)，引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全文資料庫」，下載日期：2016年4月1日，網址：<http://stfb.ntl.edu.tw/cgi-bin/g32/gswweb.cgi/ccd=kMtgkS/record?r1=1&h1=4>。

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臺北：臺灣農林考察團，1937)，引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下載日期2016年4月1日，網址：<http://rarebook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99/index.htm>。

〈陳振鐸介紹〉，「民國人物大辭典」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10月5日，網址：<http://www.hgzz.net/zhuanti/72800.html>。

「磯永吉小屋：舊高等農林學校作業室」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10月5日，網址：<http://iso-house.agron.ntu.edu.tw/iso.html>。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沿革簡史〉，「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10月5日，網址：http://www.ac.ntu.edu.tw/zh_tw/intro/intro1。

〈徐慶鐘〉，「維基百科」網頁，下載日期2017年10月7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6%85%B6%E9%90%98>。

〈關於本場：歷任場長簡介—吳振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網站，下載日期：2018年5月1日，網址：<https://www.tres.gov.tw/view.php?catid=1635>。

八田與一

1936 〈福建省管見〉，《臺灣の水利》(臺北) 184: 7-17。

1937 〈福建省土地改良其他に關する視察報告書〉，《臺灣技術協會誌》(臺北) 1(2): 113-118。

1937 〈福建省視察〉，《臺灣技術協會誌》(臺北) 1(2): 86-96。

上野忠貞

1937 〈對林業之感想〉，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70-72。福州：臺灣農林考察團。

1937 〈福建省の林業〉，《臺灣技術協會誌》(臺北) 1(4): 272-282。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

2002 《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臺北：稻鄉出版社。

中村孝志（編）

1988 《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奈良：天理教道友社。

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編輯部（編）

1988 《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茶業卷》。北京：農業出版社。

今川瑛一、松尾大

1973 《日貨排斥：アジア民族主義と日本》。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王慶鵬

2012 〈福州三坊七巷「電光劉」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法學碩士論文。

台江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7 《台江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末廣昭（編）

2006 《「帝国」日本の学知（第6卷）：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

田中耕司（編）

2006 《「帝国」日本の学知（第7卷）：実学としての科学技術》。東京：岩波書店。

旭（筆名）

1932 〈對日經濟絕交的過去〉，《福建民眾》（福州）2(5): 4-6。

朱 銜

1936 〈告福建青年〉，《群力》（上海）1(9): 5-6。

呂紹理

2005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李時霖（總編）

2004[1937] 《臺灣考察報告》，收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臺灣輿地資料專輯（第8冊）》。北京：九州出版社。

李登輝

1991 〈「王益滔教授論文集」序〉，收於王益滔編著，《王益滔教授論文集》，第一冊，頁序 1-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系。

汪毅夫

2000 〈臺灣遊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臺灣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收於汪毅夫，《閩臺歷史社會與民俗文化》，頁 10-20。廈門：鷺江出版社。

使領館消息：駐臺北總領館通訊（第三、四、五號）

1935 〈（一）福建省政府陳主席來臺視察暨本館招待情形、（二）廈門市市長王固磐來臺親察暨本館招待情形、（三）本館招待來臺參觀博覽會併視察文化產業各團體紀略〉，《外部周刊》（南京）92: 16-18。

來 件

1936 〈人民呼聲：福建軍人反日救國會宣言〉，《文化周報》（西安）1(3): 18。

周明德

1999 〈福建省主席陳儀參觀「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臺灣風物》（臺北）49(3): 9-18。

林文凱

- 2018 〈日本治臺經驗取鑑：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01: 117-155。

林光華（編著）

- 2006 《茶界泰斗：張天福畫傳》。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

林 星

- 2011 〈博覽會視角下的近代閩臺交流〉，《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福州）2011(2): 11-16。
2012 〈日據時期閩臺農業交流的概況及特點〉，《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福州）2012(4): 103-109。

林滿紅

- 1993 〈臺灣資本與兩岸經貿關係（1895-1945）：臺商拓展外貿經驗之一重要篇章〉，收於宋光宇編，《臺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頁 67-139。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6 〈中日關係之一糾結：1932 至 1941 年間臺灣與東北貿易加強的社會意涵〉，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頁 485-52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藤正己

- 1996 《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

南京農業大學（編）

- 2012 《南京農業大學發展史：歷史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

- 1938 《南支産業に関する講演集》。臺北：南洋協會臺灣支部。

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譯）

- 1938 《福建建設報告（第 1-2 輯）》。臺北：南洋協會臺灣支部。

後藤乾一

- 1992 〈台湾と南洋：「南進」問題との関連で〉，收於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2：帝国統治の構造》，頁 147-175。東京：岩波書店。

胡茂勝、曹幸穗

- 2010 〈金陵大學農學院與中國高等農業教育近代化〉，《農業考古》（南昌）2010(1): 384-388。

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籌備會（編）

- 1967 《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論文集》。臺北：徐慶鐘先生周甲紀念籌備會。

荒木安宅

- 1937 〈農業水利問題〉，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68-69。福州：臺灣農林考察團。
1937 〈福建省の耕地と水〉，《臺灣技術協會誌》（臺北）1(4): 265-271。
1938 〈福建省の水利〉，收於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南支産業に関する講演集》，頁 27-30。臺北：南洋協會臺灣支部。
1938 〈福建省の農業水利〉，《臺灣の水利》（臺北）8(3): 87-92。

張 劍

- 1998 〈金陵大學農學院與中國農業近代化〉，《史林》（上海）1998(3): 79-90。

張天福

- 1933 〈國難與國術〉，《協大學生》（福州）1933(9): 6-8。
1935 〈臺灣之茶業〉，《協大學術》（福州）3: 1-24。
1936 〈福安茶業改良場二十四年度工作報告〉，收於福建省建設廳編，《福建省建設廳附設農林機關二十四年度工作報告》，頁 175-260。福州：福建省建設廳。
1937 〈改良福建茶業與職業教育的實施（附圖表）〉，《安農校刊》（福安）1(2): 8-14。

張玉法

- 1998 《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梁定蜀

- 1934 〈報告：福州電氣公司農村電化部事業概況〉，《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南京）9: 52-58。

梁華璜

- 2001 《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臺閩關係史》。臺北：稻鄉出版社。
2004 《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
2007 《梁華璜教授臺灣史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異人（譯）

- 1936 〈福建民眾之抗日運動〉，《小譯叢》（上海）1(2): 91-94。

陳小冲

- 2013 《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北京：九州出版社。

陳振鐸

- 1930 〈福州本地稻作改良之要點（附表）〉，《農話》（福州）2(21-23): 12-16。
1931 〈最近日本之土壤肥料學界〉，《中華農學會報》（南京）88: 25-35。
1931 〈福州之橘業〉，《農話》（福州）3(9/10): 2-7。

陳振鐸、樓金寶、章萬榮

- 1932 〈閩侯科貢鄉農事基本調查報告〉，《中華農學會報》（南京）100: 97-109。

陳鴻圖

- 2019 〈第三章 施展抱負：八田與一及其在臺灣的水利試驗〉，收於陳鴻圖，《人物、人群與近代臺灣水利》，頁 71-96。新北：稻鄉出版社。

菊池貴晴

- 1974 《增補中国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對外ボイコット運動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華強素

- 1933 〈抗日和準備：華強素先生在警官養成所之講演〉，《福建警友》（福州）3: 45-50。

黃濤

- 2007 〈大德是欽：記憶深處的福建協和大學〉。福州：福建師範大學歷史學專業博士論文。

黃新憲

- 2003 《閩臺教育的交融與發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黃嘉康

- 2014 〈近代福建新式教育推手：陳寶琛與福建教育近代化事業〉，收於周佳榮、范永聰主編，《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頁 303-324。香港：三聯書店。

資誠聯合會計事務所(編)

2010 《傳誠：資誠40週年紀念專刊》。臺北：資誠聯合會計事務所。

福建省建設廳(編)

1936 《福建省建設廳附設農林機關二十四年度工作報告》。福州：福建省建設廳。

福建省政府(編)

1939 《閩政叢刊15：福建省之特產產銷》。福州：福建省農業改進處。

1939 《閩政叢刊18：福建省之農林》。福州：福建省農業改進處。

臧運祜

2003 〈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華南政策〉，《近代史研究》(北京)2003(3): 50-79。

褚靜濤

2007 〈陳儀與福建的現代化〉，《閩臺文化交流》(漳州)2007(1): 56-63。

2013 《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劉海峰、莊明水

1996 《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劉崇倫

1931 〈福州電氣公司農村電化部之庶績〉，《中行月刊》(上海)3(4): 97-103。

潘健

2010 〈1930年代福建「經建學臺灣」的三次考察〉，《閩臺文化交流》(漳州)2010(3): 36-42。

鄭梓

2005 〈1930年代福建如何「經建學臺灣」？：以日治時期兩份「臺灣考察報告」為核心的初探〉，收於賴澤涵、朱德蘭主編，《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頁143-167。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賴恆毅

2010 〈臺灣的行旅經驗及其文化意涵：以「臺灣勸業共進會」相關記錄為例〉，《實踐博雅學報》(臺北)14: 89-113。

磯永吉

1937 〈福建省の食料作物の改良に就て〉，《臺灣技術協會誌》(臺北)1(4): 259-264。

1937 〈臺灣農業之發展與所見、福建省農業現狀之感想〉，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63-67。福州：臺灣農林考察團。

1937 〈臺灣稻麥作之改良〉，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79-92。福州：臺灣農林考察團。

1938 〈農作物より見たる福建省〉，收於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南支産業に關する講演集》，頁33-37。臺北：南洋協會臺灣支部。

磯永吉、陳振鐸、王念烈

1948 〈臺灣甘藷之栽培(未完)(附圖表)〉，《農報》(臺北)2(5/6): 45-59。

1948 〈臺灣甘藷栽培(一續)(附圖表)〉，《農報》(臺北)2(7/8): 7-59。

1948 〈臺灣甘藷之栽培(二續)(附表)〉，《農報》(臺北)2(9/10): 36-49。

1948 〈臺灣甘藷之栽培(完)(附表)〉，《農報》(臺北)2(11/12): 48-58。

鍾淑敏

2004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收於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頁 399-451。臺北：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7 〈拡散する帝国ネットワーク：廈門における台湾籍民の活動〉，收於石田憲編，《膨張する帝国 拡散する帝国：第二次大戦に向かう日英とアジア》，頁 121-161。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嚴如平、賀淵

2011 《陳儀全傳：蔣介石重臣陳儀的傳奇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

鐘健英、吳國安

1989 〈論抗戰時期福州報刊的救亡活動及其歷史意義〉，《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1989(3): 58-67。

櫻井芳次郎

1937 〈果樹的改良〉，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93-97。福州：臺灣農林考察團。

1937 〈臺灣園藝事業之發達與所見、福建省園藝發達之感想〉，收於臺灣農林考察團編，《福建省農林視察報告書》，頁 73-78。福州：臺灣農林考察團。

1937 《福建省の園藝に關する調査》。臺北：南洋協會臺灣支部。

1938 〈臺灣と南支の果物〉，收於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編，《南支産業に關する講演集》，頁 16-26。臺北：南洋協會臺灣支部。

Dubious Cross-Strait Relations: Exchang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Investigation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1934-1937)

Wen-kai Lin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Fuji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focused mainly on the evolution of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s southern expansion policy and the activities of Taiwanese in Fujian. In contras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xchange activities on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investigation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during 1934-1937, a topic which has received little academic attention.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after Chen Yi became the governor of Fujian province in 1934, offic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beca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A series of exchange activities related to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investigation were conducted. Officials from Fujian carried out three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s on Taiwan's economic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hile experts of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were sent by the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to Fujian for inspec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ultation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of these exchange activities with Fujian's policy of emulating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as well as Taiwan's southern expansion policy. Moreover,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different intentions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and Fuji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behind th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exchange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Fuji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especially its agrarian reform, another issue that has been overlook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 Learning from Taiw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Investigation, Exchange of Knowledge, Southern Expansion Policy, Fujian's 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ion